

## 嘉禾吏民田家莝的生成、 性質及其功能

凌文超\*

嘉禾吏民田家莝的同文符號、剖分線、殘字和同文莝等遺存形態表明，田家莝符合券莝「大書中央，中破別之」的特徵。同文符號的橫筆橫跨左、中、右三莝，不少券莝兩個「文」字騎縫，兩側遺存「剖分線」，或者削去兩側文字，以及左、右同文莝不能拼合，且能識別出一些中莝，均體現出田家莝很可能是經過兩次破莝生成的一式三份的「三辨券」。其形制特徵與漢晉時期券莝的形態基本相同。

田租類竹簡入受莝與田家莝雖然皆為「三辨券」，但兩者的行政功能不同。田租類竹簡入受莝當屬於「出入券」，反映的是運繳管理者鄉部與倉庫物資收受的關係，作為物資送交憑證使用。理論上鄉部持「出券」（左莝、出受莝），倉持「入券」（右莝、入受莝），另一份「入券」（中辨券、中莝、入受莝）提交給倉曹或縣廷監管機構，以供檢校。

田家莝反映的是鄉部與田家、田戶曹三方的關係。鄉部代表孫吳官方，依據「出券」以及戶口、田畝數據，逐一製作各戶田家莝，詳細記錄每戶田家田租完納、送繳至倉庫的具體情形，左莝給田家，右莝自存，中莝（中辨券）提交給田戶（經用）曹。田戶（經用）曹依據倉曹或監管機構保管的「入受莝」（中辨券）以及掌管的戶口、田畝、倉庫收受物資等數據，對各鄉部田家莝進行檢校。田家莝兼具三大功能：田家完稅憑證、物資輸納憑證和對帳功能。孫吳券莝制度大體上承續秦漢「三辨券」的傳統。

關鍵詞：走馬樓吳簡 田家莝 三辨券 出入券

---

\* 北京師範大學歷史學院  
本文為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規劃基金項目「出土簡牘與秦漢魏晉田租制度研究」（22YJA770011）的階段性成果。

## 一·引言

嘉禾吏民田家荊（以下簡稱「田家荊」）是迄今所見形制最大的由木簡編連而成的簿書，也是走馬樓吳簡中最为特殊的一類。其標題簡自名為「荊」或「草」：

1. 南鄉謹列嘉禾四年吏民田家別頃畝早孰（熟）收米錢布付授吏姓名年月都荊（4.1）
2. 桑<sup>1</sup>、樂二鄉謹列嘉禾四年吏民田家別荊如牒（4.2）
3. 東鄉謹列四年吏民田家別荊（4.3）
4. 平<sup>2</sup> 謹列<sup>3</sup> 嘉禾四年<sup>4</sup> 吏民田頃畝收<sup>5</sup> 錢布草如牒（4.4）

「荊」「草」音近可通。<sup>6</sup> 走馬樓吳簡中，「荊」「草」常互用，例如：

5. 鄉民文龍入嘉禾二年子弟米二斛餽畢 嘉禾二年十二月廿日付郭浦倉吏劉達<sup>7</sup> 受副曹（陸·1660·圖 17-3 / 發 12）<sup>8</sup>

<sup>1</sup> 「桑」，原釋作「環」，據圖版改。

<sup>2</sup> 「平」，原闕釋，據圖版補。

<sup>3</sup> 原注：「『謹嘉』二字之間右側似有一字殘痕，不能識別。」疑作「列」。

<sup>4</sup> 「四年」，原闕釋，據圖版及伊藤敏雄、阿部幸信意見補。長沙吳簡研究會編，伊藤敏雄、阿部幸信主編，〈『長沙走馬樓三國吳簡 嘉禾吏民田家荊』釈文補正〉，長沙吳簡研究會編，《長沙吳簡研究報告》第2集（新瀉：新高速印刷株式会社，2004），頁96。

<sup>5</sup> 「錢」上脫「米」字。

<sup>6</sup> 參見李均明、周自如、楊慧，〈關於長沙走馬樓嘉禾田家荊的形制特徵〉，《簡帛研究》2001（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頁485；胡平生，〈嘉禾四年吏民田家荊研究〉，長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編，《長沙三國吳簡暨百年來簡帛發現與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北京：中華書局，2005），後收入氏著，《胡平生簡牘文物論稿》（上海：中西書局，2012），頁350-351。

<sup>7</sup> 「劉達」，花押，原釋作「焉達」，據圖版及對應簡例捌·4521、4522釋文改，下同。

<sup>8</sup> 本文徵引吳簡標注卷次和整理號，必要時標出揭剝位置示意圖編號和盆號，例如「4.1」指嘉禾四年整理號為1的田家荊，「陸·1660·圖 17-3 / 發 12」指《竹簡（陸）》中整理號為1660、揭剝位置示意圖編號為圖 17-3 位於發掘簡第12盆中的竹簡。各卷出版資訊如下：長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編著，《長沙走馬樓三國吳簡·嘉禾吏民田家荊》（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長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編著，《長沙走馬樓三國吳簡·竹簡（壹）》（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長沙簡牘博物館等編著，《竹簡（貳）》、《竹簡（叁）》、《竹簡（肆）》、《竹簡（伍）》、《竹簡（陸）》、《竹簡（柒）》、《竹簡（捌）》、《竹簡（玖）》（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2008、2011、2018、2017、2013、2015、2019）。出土訊息亦請參見各卷下冊附錄一。

6. □鄉魁伍文入二年子弟米卅斛五斗一升胄畢 嘉禾二年十一月十八日付郭浦倉劉達受副曹（陸·1661·圖 17-4 / 發 12）【注】簡面有朱筆跡。
7. 新 茨 (?) 鄉 焉 追入二年子弟米八斛胄畢 嘉禾二年十一月十八日付倉吏劉達受副曹（陸·1662·圖 17-5 / 發 12）【注】簡面有朱筆跡。
8. 新 茨 鄉陳里帥伍陵入二年帥客米卅一斛胄畢 嘉禾二年十一月廿日付郭浦倉吏劉達受副曹（陸·1663·圖 17-6 / 發 12）【注】簡面有朱筆跡。
9. 右十一萁入米合二百卅七斛六斗一升（陸·1664·圖 17-7 / 發 12）  
簡 5-9 位於發掘簡第 12 盆IIa③坨，編號相連，內容相關，形制相同，屬於同一簿書。簡 9 為簡 5-8 的集計簡。簡 9 記錄的「萁」即指簡 5-8 這類倉米「入受蒯」。<sup>9</sup> 入受蒯的集計簡又常記作「蒯」，如：  
10. 右桑鄉入嘉禾二年布蒯五十四枚合六十九匹一丈七尺（壹·8256）  
11. 右蒯廿五枚布合五十匹三丈二尺（貳·5321）  
可見，走馬樓吳簡中「蒯」「萁」通用。

田家蒯的標題簡明確題名為「蒯」。然而，簡 1 記作「都蒯」，簡 2、3 又有「別蒯」的記錄。一些學者將這兩種不同的稱謂皆視為田家蒯的專有名稱，只是其定名依據存在不同。一種意見依據《廣雅·釋詁》：「都，聚也。」「都，大也。」<sup>10</sup> 而田家蒯詳細記錄了「吏民田家別頃畝早熟（熟）收米錢布付授吏姓名年月」等事項，以及三次付受過程，其內容具有匯總性，形制也比較大，故稱「都蒯」；「別蒯」乃是從剖蒯角度的稱謂。別，分別。全蒯由二或三份組合而成，凡是其中之一，即稱「別蒯」。<sup>11</sup> 另一種意見則認為，田家蒯是官府的庫吏或倉吏將當年佃戶繳納米錢布等租稅的分散帳目匯總後，上交給田戶曹吏進行核校結算的總帳目，即年度戶別稅鈔總計，因為它是「別蒯」的匯總，所以稱為「都蒯」。<sup>12</sup>

與上述意見不同，胡平生先生認為，「別」「蒯」雖然通假，但是，標題簡中的「別」「蒯」二字是有區別的，分別指不同類型的兩種券書。「別」可能包

<sup>9</sup> 這類帶有同文符號的券蒯，上欄記錄吏民納「入」物資，下欄記錄交付給倉庫吏接「受」，本文依據該格式，將此類券蒯定名為「入受蒯」。

<sup>10</sup> 清·王念孫，《廣雅疏證》（北京：中華書局，1983），卷三下，〈釋詁〉，頁 94；卷一上，〈釋詁〉，頁 5。

<sup>11</sup> 李均明等，〈關於長沙走馬樓嘉禾田家蒯的形制特徵〉，頁 486-488。

<sup>12</sup> 李卿，〈《長沙走馬樓三國吳簡·嘉禾吏民田家蒯》性質與內容分析〉，《中國經濟史研究》2001.1：122-125。

含繳米、繳布、繳錢等小型的竹別合同券書；「荊」則特指「都荊」，匯總上述三種竹別券書而製作的合同券書，質材也使用較為經久耐用的杉木。因此，他主張應將「別荊」理解為繳米、繳布、繳錢三種分類之「別」的「都荊」。<sup>13</sup>

田家荊的標題簡與其記錄的內容相互對應，茲例舉一枚田家荊的內容如下：

三州丘男子唐端，佃田五町，凡廿八畝七步，皆二年常限。其十五畝早  
敗不收布。定十三畝七十步，為米十五斛九斗，畝收布二尺。其米十五斛  
九斗，五年十二月九日付倉吏張曼、周棟。凡為布二丈六尺，准入米一斛  
六斗一升，五年十二月十八日付吏孫儀。其早田不收錢。其孰田畝收錢八  
十，凡為錢一千冊，五年十二月十八日付庫吏潘慎、潘宗畢。嘉禾六年二  
月廿日，田戶曹史張惕、趙野校。（5.1）

簡 5.1 具體記錄了嘉禾五年各（鄉）丘吏民的佃田面積、類別，以及相應的米、錢、布租稅交付給倉、庫吏，並由田戶曹史檢校等內容。這與標題簡 1 所記大體上相契合。嘉禾四年、五年田家荊內容上具有一致性，相應地，標題簡 1-4 也應當是一致的，只是記錄的詳略不同而已。由此看來，田家荊標題簡 2、3 記錄的「別荊」應為簡 1「別頃畝早、孰收米、錢、布，付授吏姓名，年、月都荊」的省稱。「別」具體指分別按「早」、「孰（熟）」田繳納不同稅額的米、錢、布；「荊」即「都荊」，各項田租繳納資訊匯總合記在同一荊上，故稱「都荊」。

雖然田家荊的標題簡明確題名為「荊」，但是，其性質是否券荊，學界存在兩類截然相反的意見：一類意見認為田家荊是破荊而來的券書，另一類意見則認為是單獨製作的匯鈔而成的總帳目。這兩類意見的分歧集中在，田家荊是否破荊而來。

（一）持肯定意見的學者，又在田家荊一式幾份及其歸屬的問題上存在諸多分歧，甚至同一學者從不同角度對此提出了多種看法。(1) 一式兩份。發掘者根據大木簡頂端有墨書「同」字或描畫的與「同」具有同等意義的符號，以及左側或右側殘留著剖分痕跡，背面還發現在同一條直線（分隔號）上用金屬器等距離鑿斫的眼孔供破荊之用等資訊，推斷大木簡是左右分券形式。<sup>14</sup>

持一式兩份觀點的研究者，對於兩份券荊的歸屬存在不同的意見。胡平生先生認為，田家荊是由田戶曹史製作的「佃田租稅券書」，一份保存在田家手中，

<sup>13</sup> 胡平生，〈嘉禾四年吏民田家荊研究〉，氏著，《胡平生簡牘文物論稿》，頁 350-353。

<sup>14</sup> 宋少華、何旭紅，〈長沙走馬樓二十二號井發掘報告〉，長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長沙走馬樓三國吳簡·嘉禾吏民田家荊》上冊，頁 30。

另一份保存在田戶曹官署。<sup>15</sup> 邱東聯先生認為，田家莝是孫吳長沙郡官府保存的經濟契約合同文書，主要是左右別券，一份由（長沙郡）官府保存，另一份由佃戶保管。<sup>16</sup> 關尾史郎先生對田家莝為「納稅證明書」「租佃契約書」的說法提出質疑。他認為田家莝主要由臨湘侯國田曹、戶曹集計上一年度由倉曹（倉吏）、（金曹）庫吏集積的相關小型竹簡而作成，完成校核後賦予其莝的功能，之後莝被送到鄉，鄉依據其保管的資料進行確認，正確無誤後加以裁斷，一片留鄉，另一片附上標題簡由勸農掾這類縣吏送還，大概還是由田曹和戶曹共同保管。<sup>17</sup> 王颯先生則根據田家莝字跡分類判斷，田家莝由臨湘侯國田戶曹製作，一份保留在縣級部門，另一份返還各鄉存檔或者上交更高一級部門。<sup>18</sup>

(2) 一式三份。發掘者指出，在發掘過程中發現一根長達 163 公分的杉木條，其色澤、寬厚皆與大木簡相同，若截成大木簡的話，恰好三枚，這是否暗示著還存在其他的別券方式，有待進一步的考慮。<sup>19</sup> 胡平生先生等整理者注意到，券莝頂端有合「同」符號，有的明顯地為剖開的「同」字的左側，該券應為左券；有的為「同」字的右側，該券應為右券；有的只有若干橫線，可能是對合「同」字作了符號式的簡化，也有可能是漢簡中屢次提到的「三辨券」（一式三份的券書）中的中券（中間的一份）。<sup>20</sup>

<sup>15</sup> 胡平生，〈木簡券書破別形式述略〉，《簡牘學研究》第 2 輯（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1998），後收入氏著，《胡平生簡牘文物論稿》，頁 70-72；胡平生，〈《嘉禾四年吏民田家莝》統計錯誤例解析〉，《簡帛研究》2001（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後收入氏著，《胡平生簡牘文物論稿》，頁 393。

<sup>16</sup> 邱東聯，〈長沙走馬樓佃田租稅簡的初步研究〉，《江漢考古》1998.4：75-76。

<sup>17</sup> 關尾史郎，〈吏民田家莝の性格と機能に関する一試論〉，長沙吳簡研究會編，《嘉禾吏民田家莝研究——長沙吳簡研究報告》第 1 集（新潟：新高速印刷株式会社，2001），頁 3-15；關尾史郎，〈破莝・別莝考——長沙吳簡を例として〉，藤田勝久編，《東アジアの資料学と情報伝達》（東京：汲古書院，2013），中譯本見氏著，蘇俊林譯，〈破莝、別莝考——以長沙吳簡為例〉，長沙簡牘博物館編，《走馬樓吳簡研究論文精選》（長沙：嶽麓書社，2016），頁 515-519。

<sup>18</sup> 王颯，〈嘉禾吏民田家莝字跡及相關問題研究〉（長春：吉林大學古籍研究所碩士論文，2014），頁 88-94。

<sup>19</sup> 宋少華、何旭紅，〈長沙走馬樓二十二號井發掘報告〉，長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長沙走馬樓三國吳簡·嘉禾吏民田家莝》上冊，頁 30。

<sup>20</sup> 〈嘉禾四年吏民田家莝解題〉，長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長沙走馬樓三國吳簡·嘉禾吏民田家莝》上冊，頁 71。後來，胡平生、汪力工先生對田家莝「同」「同文」符號有更為詳細的研究，參見其作〈走馬樓吳簡「嘉禾吏民田家莝」合同符號研究〉，《出土文獻研究》第 6 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頁 238-259。

持一式三份看法的學者在田家蒯歸屬問題上的理解也有差異。李均明等先生認為，田家蒯是帳帳核對過程中產生的，其功能相當於「校券」，是田戶曹對倉與庫收取田家租稅（包括米、錢、布）帳目的核實，涉及三方，故其蒯當由田戶曹、倉、庫分別持有。<sup>21</sup> 胡平生先生仔細分析了田家蒯的製作過程。先由鄉官、田官會同田家共同製作「別券」一份，內容包括田家住址、身分、姓名、佃田塊數、畝數，田畝性質（常限田或餘力火種田）、早熟情況等。田家繳納米、布、錢時，可能先到邸閣吏、丞、庫吏處，根據「別券」計算出應繳額，然後分別向倉、庫繳納物資，領取繳納憑證券書。翌年二三月間，田戶曹吏將田家或倉庫吏持有的幾份「別券」匯總，寫成一份「都蒯」。田家蒯如果是一式三份，可能就是田戶曹與倉、庫之間的結算憑據，一份給倉吏，一份給庫吏，一份留田戶曹。<sup>22</sup>

(3) 一式四份。胡平生先生推測田家蒯還有一種上下左右一式四份的形式，除了倉吏、庫吏、田戶曹以外，田家也持有一份。<sup>23</sup>

此外，還有一些研究者雖然未探討田家蒯的分券，但是對其券蒯的具體性質進行了探討。高敏先生認為，田家蒯不僅具有土地租佃者租佃土地契約的性質，而且明顯具有收受輸納物的憑證或收據性質。<sup>24</sup> 蔣福亞先生認為，田家蒯應有兩種，目前所見到的，實質上是租佃者租種國有土地的繳稅憑證，並非租佃契約。另外還存在一種作為租佃契約的「吏民田家別蒯」。<sup>25</sup> 孟彥弘先生認為，田家蒯是政府分配土地以及根據不同地力以徵收不同租稅錢布的登記冊，當然也具有契約的作用。正因為是屯田，纔如此正式，其形制纔如此特殊。<sup>26</sup>

(二) 持否定意見的學者則認為田家蒯並非破蒯而來的券書。楊際平、李卿先生對照前涼、北涼與高昌時期各種券契所見的有關署券、執券的套話，認為大

<sup>21</sup> 李均明等，〈關於長沙走馬樓嘉禾田家蒯的形制特徵〉，頁 490。

<sup>22</sup> 胡平生，〈《嘉禾四年吏民田家蒯》統計錯誤例解析〉，氏著，《胡平生簡牘文物論稿》，頁 392-394。

<sup>23</sup> 胡平生，〈木簡券書破別形式述略〉，氏著，《胡平生簡牘文物論稿》，頁 71。

<sup>24</sup> 高敏，〈論《吏民田家蒯》的契約與憑證二重性及其意義——讀長沙走馬樓簡牘劄記之二〉，《鄭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0.4，後收入氏著，《長沙走馬樓簡牘研究》（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頁 10-16。

<sup>25</sup> 蔣福亞，〈有關《嘉禾吏民田家蒯》性質的補充意見〉，《南京曉莊學院學報》2002.1：17-19。

<sup>26</sup> 孟彥弘，〈《吏民田家蒯》所錄田地與漢晉間的民屯形式〉，《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學刊》第 2 集（北京：商務印書館，2004），後收入氏著，《出土文獻與漢唐典制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頁 45。

木簡標題所記之「莝」也只是「格式化的套話」，其頂端的合「同」符號雖然是從破莝符號沿用而來，但它並非真正用於破莝。換言之，他們認為田家莝並非剖分而來的一式兩份，而是單獨製作的。吏民在繳納租稅時，官府已經製作了一式兩份的券書，一份給田家作為「完納憑證」，另一份官府留下作為「會計憑證」的存根。田家莝就是官府將收納的分散帳目「會計憑證」匯抄而成的總帳目，其性質是官府保存的吏民交繳租賦的總帳歷。<sup>27</sup> 即嘉禾吏民田家莝是地方政府職能機構整理、匯總各縣鄉吏民繳納稅糧錢布的總冊。這純屬各政府職能部門的內部事務，與原先繳納稅糧錢布的吏民無關。因此不必要，也絕不可能再寫一份發給吏民保存。<sup>28</sup>

張榮強先生則認為，鄉吏將田戶佃田、賦稅交納等情況匯總成冊（即「田家莝」）後，上呈田戶曹史檢校。從本質上看，它應當是一種「簿」，是經田戶曹史檢校的鄉租稅簿。<sup>29</sup>

學界結合田家莝的形制特徵、記錄的內容以及秦漢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券莝實物，對上述問題展開了細緻分析，並就各種破莝可能性都作出了解釋或質疑，幾乎題無剩義。但是，為了準確認識田家莝的性質與功能，又不得不追尋解答這一難題的線索。筆者嘗試在田家莝中追索本證，並且結合年代相近的漢晉券莝實物進行考察，再通過分析竹簡中田租類入受莝的形制特徵與功能，推導田家莝的製作過程，進一步明確田家莝的性質，探索其實際行政功能。

## 二· 同文符號與破莝

券莝的形制特徵是：「莝，別也，大書中央，中破別之。」<sup>30</sup> 這在田家莝中

<sup>27</sup> 李卿，〈《長沙走馬樓三國吳簡·嘉禾吏民田家莝》性質與內容分析〉，頁 125-126；楊際平、李卿，〈魏晉隋唐券書常見的有關署券、執券的套話〉，殷憲主編，《北朝史研究——中國魏晉南北朝史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北京：商務印書館，2004），後收入楊際平，《楊際平中國社會經濟史論集》第 3 卷：出土文書研究（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2016），頁 514-516。

<sup>28</sup> 楊際平，〈我國古代契約史研究中的幾個問題〉，《中國史研究》2019.3：94-95。

<sup>29</sup> 張榮強，〈孫吳「嘉禾吏民田家莝」中的幾個問題〉，《中國史研究》2001.3，後收入氏著，《漢唐籍帳制度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10），頁 295-298。

<sup>30</sup> 劉熙撰，畢沅疏證，王先謙補，《釋名疏證補》（北京：中華書局，2008），卷六，〈釋書契〉，頁 205。

凌文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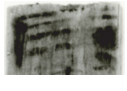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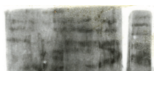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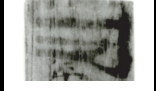

都有直觀的反映。「大書中央」主要反映在合同符號上（即「同文符號」，由「同文」二字組合而成的符號及其衍生符號）。整理者指出，田家荊頂端的「同文」符號，有的為「同」字的左側（左券），有的為「同」字的右側（右券），有的只有若干橫線（或為簡化符號，或為中券），整理者對此有很好的分類整理。<sup>31</sup>

反對者則認為，簡首的同文符號並非用於破荊，<sup>32</sup> 只是在形式上沿用了合同符號，是格式化的套話。其反駁的具體理由是：

如果是一式兩份的簡牘券書，那麼，用於標示破荊合同的符號（若干橫線）或「同」字，就應該寫在兩簡牘的騎縫，或橫貫兩簡牘。無論哪種情況，左券的右端和右券的左端，都應有明顯的連接符號。然視《嘉禾吏民田家荊》圖版，很多木牘上端的符號，橫線並未抵邊。四·二五一與四·二六六為文物整理組〈嘉禾四年吏民田家荊解題〉視為左券的兩例，然視圖版，恐怕不可能，因為這兩號木牘上端符號兩側都有豎筆（如果其字為「同」字，那也就是說「同」字中之「口」並未一分为二）。四·二七一與四·二九三號木牘，〈解題〉視之為右券之例，然視圖版，四·二七一號木牘上之「口」，左側已有明顯收口現象，四·二九三號木牘，「口」左側也並未抵邊，都很難作為與「左券」拼合的根據。<sup>33</sup>

為了方便分析，先將雙方討論簡例的同文符號（示例①～⑥）以及同類的同文符號（示例⑦～⑫）一併臚列如下：

表一：同文符號示例







左荊		中荊		右荊	
					
①4.251	②4.266	③4.20	④4.23	⑤4.271	⑥4.293

<sup>31</sup> 胡平生、汪力工，〈走馬樓吳簡「嘉禾吏民田家荊」合同符號研究〉，頁 238-259。

<sup>32</sup> 關於「破荊」及相關詞語的訓釋，請參見毛遠明，〈釋「破券」、「破荊」及相關的一群詞語〉，《中國語文》2009.3：276-27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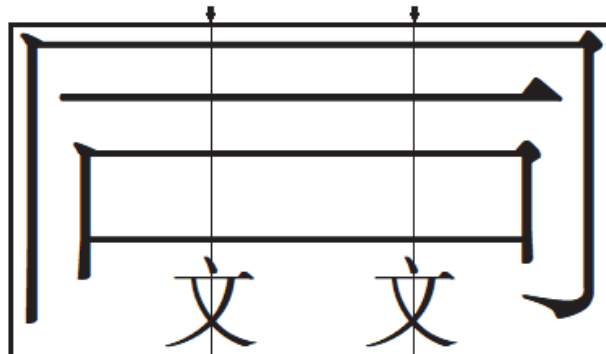
<sup>33</sup> 李卿，〈《長沙走馬樓三國吳簡·嘉禾吏民田家荊》性質與內容分析〉，頁 126。



左莝		中莝		右莝	
					
⑦4.118	⑧5.504	⑨4.25	⑩4.253	⑪5.226	⑫5.680

同文符號①~⑫顯示，田家莝分為左、中、右三券。左莝左側存「同」字首筆「丨」，右下「文」字一分為二（參見表一示例①⑦⑧）；中莝左右兩側均無「同」字兩側筆畫「丨」和「丨」，但是，左下和右下分別有被剖分的「文」字（參見示例⑨⑩）；右莝右側存「同」字右邊筆畫「丨」，左下有被剖分的「文」字（參見示例⑪⑫）。

根據同文符號的留存狀態，田家莝頂端完整形式的同文符號，應當是在木牘頂端大書「同」字，「口」的下方，小書兩個「文」字，作為剖分標誌，也增強騎縫的效果。在兩個「文」字的正中進行剖分，從而形成左、中、右三券，如圖一所示。



圖一：田家莝破莝示意圖

需要說明的是，同文符號示例和示意圖只是理想狀態下田家莝破莝的方式。在實際描畫同文符號、製作田家莝的過程中，同文符號多有簡省（有的不寫「文」字，或「文」字簡省為斜線，參 5.551、554；有的甚至整個同文符號簡省為

若干橫線），或存在破莝失誤（「文」字未起到騎縫之效，參示例③④）等情況，<sup>34</sup> 整理者對此有很好的說明，<sup>35</sup> 不再贅述。

反對合同符號用於破莝的理由歸納起來有三：第一，「很多木牘上端的符號，橫線並未抵邊」。表一示例顯示，同文符號中間墨跡濃而兩側淡。導致這種情況出現的原因主要是，田家莝原來編連在一起，莝冊的收卷和使用導致田家莝左右兩側和上下兩端筆跡最易遭到磨損，如左莝「同」字左上（示例⑦），右莝「同」字右上部位（示例⑫）的筆跡往往淺淡一些甚至磨滅。事實上，絕大多數田家莝同文符號的橫線在剖分之處都抵邊，表一示例也反映出橫線在左莝右側、中莝兩側、右莝左側貫穿左中右三莝，只是因莝冊編連、收卷造成的磨損以及因久埋地下造成的筆跡漫漶，導致一些券莝同文符外側筆跡淺淡甚至磨滅。因此，這一反駁理由比較牽強。

第二，「（左莝）上端符號兩側都有豎筆」。事實上，左莝右側並非「同」字的「丨」筆，而是「文」字被剖分後殘留的左半部分，示例⑦⑧可以清晰地反映這一點。因此，這一反駁理由也難以令人信從。

第三，「（右莝）左側已有明顯收口現象」以及「『匚』左側也並未抵邊」。事實上，那是筆跡漫漶導致的干擾痕跡，以及因磨損導致的筆跡淺淡甚至磨滅。參照示例⑨⑩，田家莝有時會在剖分處書寫「文」字進行剖分，右莝的左側從而留存半個「文」字（示例⑪⑫），起到騎縫之效。因此，這一反駁理由也缺乏說服力。

綜上，田家莝的同文符號，不僅橫筆橫跨左、中、右三莝，而且「文」字預作破莝、騎縫之用，「同」字兩側的筆畫「丨」和「丨」也有助於識別左、右莝（中莝當然也就容易識別了）。這些跡象均表明，同文符號具備實際的破莝和合同文書的功能。同文符號位於田家莝頂端，很多磨損、漫漶，或簡省為若干橫線（不少應為中莝）。即使如此，那些圖版較為清晰，能夠準確反映左、中、右莝的較為規整的同文符號也還有不少，具體請參見附錄一。

<sup>34</sup> 示例③④這類由若干橫線和單個「文」字構成同文符號，在田家莝中大量存在，詳見附錄一。這類同文符號左、右邊沒有「同」字兩側筆畫「丨」和「丨」，缺失「文」字一側多有剖分線，如 5.676、686，特別是 4.129 左下側文字「張惕、陳通」被削去一半，右側遺存剖分線，5.675 左、右兩側部分文字皆被削去部分筆畫，比較直觀地顯示這類同文符號所在的田家莝應為「中莝」，或者說為「中莝」的可能性要高一些。筆者暫且將這類同文符號歸入「中莝（存疑）」一類。

<sup>35</sup> 胡平生、汪力工，〈走馬樓吳簡「嘉禾吏民田家莝」合同符號研究〉，頁 238-259。

### 三· 剖分線、殘字與破荊

「中破別之」不僅反映在同文符號尤其是「文」字騎縫破荊上，也體現在剖分線和破荊失誤造成的殘字上。〈解題〉對破荊有簡要的介紹：

荊券先書寫後破荊，惟書寫前預先用刀刻劃了邊線，有的還用一種長十八毫米、寬二毫米的小鑿子沿邊線打鑿孔，破荊時用利器自頂端一劈，券書便順著邊線和鑿孔耑然而開。由於木材紋理的緣故，也有少量的券書沒有按照預先劃定的邊線剖開，致使該券上殘留了被分離的左券或右券上的若干文字。鑿孔的痕跡見於四·四一簡。<sup>36</sup>

整理者細緻的觀察，為進一步研究田家荊的破荊提供了指引。只是，有兩個地方還值得進一步解釋、說明。

其一，關於所謂的「鑿孔」。整理者指出製作者在破荊前「沿邊線打鑿孔」。然而，核對圖版（參見表二示例⑬），「鑿孔」並未沿邊線（方框標識）成直線排列。這九孔中，除了兩孔位於「邊線」上，其餘七孔分布在「邊線」左側，呈不規則分布狀態，這對於破荊並無多少用處。長沙簡牘博物館熊曲女史細緻而全面地調查有孔的田家荊實物，發現田家荊上孔的數量多少不一，分布不規律，大小有差異，有些出現在字跡上，有些殘留木屑，甚至被木屑填滿，應是蟲蛀造成的。<sup>37</sup> 其說可從。

其二，關於「書寫前預先用刀刻劃了邊線」。倘若田家荊在書寫前就預劃了邊線，一般情況下，田家荊就應是標準寬度。然而，田家荊隨內容多少而寬窄不一，這種情況除非書寫者按內容多少逐一預估寬度而劃線（這相當麻煩，不具備可行性），否則很難實現。因此，預劃邊線說頗為可疑。

在一些田家荊上，存在「邊線」直接貫穿文字的現象，如表二示例⑭左側「嘉禾六年二月廿日田戶曹史」被刻劃線分割，又如示例⑮左側有兩條刻劃線，其中內側刻劃線縱貫「其米二斛四斗，四年十二月十二日付倉吏李金」，應是誤劃，因而再劃另一條。這些都是「先寫內容，後劃線」的明證。

所謂「邊線」，實質上是為了破荊而刻劃的「剖分線」。當田家荊內容書寫

<sup>36</sup> 〈嘉禾四年吏民田家荊解題〉，長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長沙走馬樓三國吳簡·嘉禾吏民田家荊》上冊，頁71。

<sup>37</sup> 熊曲，〈試論嘉禾吏民田家荊的破荊——以大木簡的小孔為中心〉，《出土文獻》2020.3：115-1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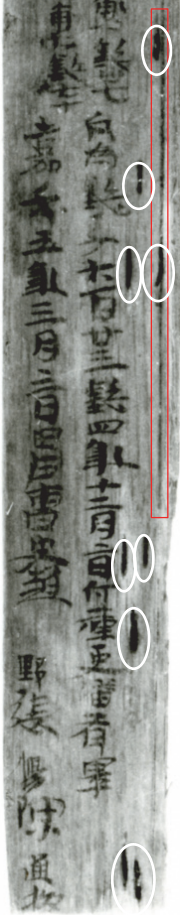




完成後，在左、中、右莝的破莝之處，即莝文內容兩側劃線，有的田家莝同文符號中還書畫了留作破莝、騎縫的「文」字，於是從「文」字處向下劃一條豎直線，作為剖分的導向。<sup>38</sup>「文」和「剖分線」都具有輔助破莝的功能，具體可參見表二示例①⑥①⑦（示例①⑥「其十畝旱敗不收，畝收布六寸六分」右側剖分線較細）。更普遍的情形是，同文符號的「文」字常省略，莝文兩側遺存剖分線，參見示例①⑧①⑨。這類「剖分線」主要供成組田家莝破莝之用，表明田家莝的製作過程中有過「破莝」環節。

那些右莝的右剖分線、左莝的左剖分線，則是為了方便分割不同組田家莝而劃。例如，示例②⑩a、b 同文符號筆畫「」顯示其為右莝，其右剖分線的右邊還遺存另莝殘字，其字形與對應位置的「嘉禾」二字明顯不同，應是另一組田家莝上的文字。又如，示例②⑪剖分線左側留存較寬的空白，大體上可製作一枚內容較少的田家莝，但不足以製作另一組田家莝，因而未再剖分。這類剖分線應是不同組田家莝之間的分割線。不少田家莝上遺存比較明顯的剖分線，其中少數可見兩側剖分線，其簡號詳見附錄二。

「殘字」也是反映破莝的依據。一些田家莝上兩側的文字，因破莝失誤而被削去半邊，如表三示例②⑫②⑬兩側文字皆被削去一半。削去的半邊文字遺存在另莝上。相應地，遺存有另莝對應文字的券莝，直接反映該券書經破莝而成。田家莝這樣的例子並不少見。如示例②⑭左側遺留殘字「年 閏 月 廿 日 付 庫 吏 番 有 畢」，與右側「年閏月廿日付庫吏番有畢」完全一致；又如示例②⑮左剖分線左邊遺留殘字「其 旱 田 不 收 錢」，與右側「其旱田不收錢」對應。左側殘字即因破莝失誤而遺存的另莝殘字。甚至還有田家莝既被削去字跡，又遺存另莝殘字，如示例②⑯右側「錢」字等被削去部分筆畫，左側應為另莝殘字「其 旱 田 畝 收 錢」。這類殘字的存在表明田家莝是經破莝而成的券書。田家莝上的殘字情況，具體請參見附錄三。

<sup>38</sup> 破莝大多數按「剖分線」的導向走。但是，也有不少田家莝在剖分時，未完全對準「剖分線」，稍稍偏離了方向，「剖分線」也因此保留下來。

表二：剖分線示例

				
<p>⑬4.41</p>	<p>⑭5.367</p>	<p>⑮4.581</p>	<p>⑯4.16</p>	<p>⑰4.148</p>

				
<p>⑱4.95</p>	<p>⑲4.286</p>	<p>⑳a4.95</p>	<p>⑳b4.95</p>	<p>㉑5.841</p>



表三：殘字示例

				
<p>②②5.675</p>	<p>②③5.937</p>	<p>②④4.772</p>	<p>②⑤5.733</p>	<p>②⑥4.31</p>

#### 四·同文莝與中莝

即使同文符號、剖分線、對應殘字能夠反映田家莝是經破莝而來的券書，也還是會有人懷疑那可能只是格式化的符號、刻線和文字。為了證明田家莝是券書，最直接了當的證據是找到兩份內容完全一致的田家莝，也就是「同文」田家莝。

一般而言，券莝一式兩三份當分屬各方，這意味著通常情況下在一方存檔的田家莝中是不可能找到兩份同文田家莝的。然而，在券莝製作和保存的實際操作過程中，總會存在這樣或那樣的失誤，莝冊中出現遺漏或重複是難以完全避免的現象。非常幸運的是，筆者在田家莝中居然找到了兩份內容完全一致的「同文田家莝」：

12. 度丘軍吏吳祇，田十四町，凡冊二畝，皆二年常限。其廿一畝早敗不收布。定收廿一畝，畝收米一斛二斗，凡為米廿五斛二斗，畝收布二尺。其米廿五斛二斗，五年十一月廿日付倉吏郭勳、馬欽。凡為布一匹二尺，准入米二斛六斗二升五合，五年十二月十日付掾孫儀。其早畝不收錢。其孰田畝收錢八十，凡為錢一千六百八十，准米四斛五斗二升，五年十一月廿日付掾孫儀。嘉禾六年二月十六日，戶曹史張惕、趙野校。（5.527）
13. 度<sup>39</sup>丘軍吏吳祇<sup>40</sup>，田十四町，凡冊二畝，皆二年常限。其廿一畝早敗不收布。定收廿一畝，畝收米一斛二斗，其米廿五斛二斗，五年十一月廿日付倉吏郭勳、馬□。凡為米廿五斛二斗，畝收布二尺。凡為□……五……趙野校。（5.1019）

同文內容以底線標示。核對圖版（表四示例⑳㉑），因兩份券莝上段內容遺存情況都比較好，5.1019 下段內容漫漶、磨滅，僅截取上欄加以對比），兩莝字跡、格式相同（莝文「凡為米廿五斛二斗，畝收布二尺」所處位置不同乃整理者釋讀時的調整），合同符號皆不書畫「文」字，且橫筆大致對應，為一類合同符號。但是，兩莝並不契合，究其原因，5.1019 合同符號殘存「同」字左側「丨」筆，表明該莝為「左莝」；5.527 合同符號殘存「同」字右側「」，表明該莝為「右莝」。兩莝不能拼合，是因為缺失了「中莝」。這也反過來證明，田家莝應當是一式三份。

<sup>39</sup>「度」，原闕釋，據圖版及對應簡例補。

<sup>40</sup>「祇」，原釋作「祇」，據圖版及對應簡例改。



另外，依據同文符號的形制、剖分線與殘字的遺存狀態，可以識別出不少田家莝很可能是「中莝」。例如，表四示例②⑨③⑩③⑪，其同文符號左、右未見「同」字兩側筆畫「丨」和「丨」，而是由若干橫線構成，示例③⑩同文符號右下還寫有「文」字；同時示例②⑨③⑩兩側文字皆被削去一些筆畫（放大圖版參見②②②③），而示例③⑪右側「其 三 畝 旱 不 收 布」被削去多半，左側遺存剖分線，部分文字如「三日付倉吏郭勳」或受剖莝影響而部分筆跡脫落。由此可見這三枚田家莝皆經過兩次剖分，應為「中莝」。諸如此類，即同文符號主要由橫線構成，兩側有殘字，或一側有殘字而另一側有剖分線，這類田家莝很可能是「中莝」，相關簡例還有：4.37、62、73、129、181、286、365、366、394、477、481、612 和 5.305、887。另有一些同文符號漫漶的類似簡例，如 4.31、374、428、469、476、478、585、600、639、648、680、740、772 和 5.301、363、488、743、893，也可能是「中莝」。

綜合上述研究，田家莝的同文符號、剖分線、殘字、同文莝及中莝等券莝遺存狀態表明，田家莝完全符合「大書中央，中破別之」的券莝特徵。同文符號兩個「文」字騎縫、不少券莝兩側遺存「剖分線」，或者削去兩側文字，以及左、右「同文莝」不能契合，並且可以根據上述特徵辨識出一些「中莝」，均體現出田家莝很可能是經過兩次破莝生成的一式三份的券書。

表四：同文莝、中莝示例



				
②75.1019	②05.527	②95.937	③05.675	③15.880

## 五·漢晉券荊與田家荊

田家荊的形制特徵與漢晉時期券荊的形態基本相同。一式三份的券荊在秦漢時期被稱為「三辨券」。<sup>41</sup> 與田家荊年代相近的漢代「三辨券」實物見於湖南益陽兔子山東漢木簡（參表五示例⑳），釋文如下：




14. 入掾胡盛平斛品米三斛五斗二升六合 建安十九年二月二日付倉嗇夫文 熊受  
入掾胡盛平斛品米三斛五斗二升六合 建安十九年二月二日付倉嗇夫文 熊受  
出掾胡盛平斛品米三斛五斗二升六合 建安十九年二月二日付倉嗇夫文 熊受  
(J6⑥3)<sup>42</sup>

參照吳簡竹簡中常見的出／入受荊的形制特徵：

15. 出小武陵鄉嘉禾二年火種租米八斛二斗  嘉禾三年正月十八日白石丘男子  
文解關邸閣李嵩付倉吏黃諱史潘慮受（貳·368）
16. 入東鄉嘉禾二年租米九斛胄畢  嘉禾二年十二月十二日新成丘州吏陳顏關  
邸閣董基付三州倉吏鄭黑受（陸·2676）

簡 14 中段預留空白，應當是用來書畫合同符號。簡 14 既未書畫同文符號，右、中荊又未完全剖分，表明此三辨券尚未製作完成。但可以據此一窺三辨券的基本樣態。

與田家荊年代相去不遠的還有西晉「三辨券」，實物見於樓蘭出土木簡（參表五示例㉓a、b），釋文如下：

17.  麥  泰始五年十一月九日倉曹掾李平、監倉掾蘇良  
 斗二升  奏曹史淳于仁、兵曹史瓠今、從掾位張雅  
  泰始五年十一月九日倉曹掾李平、監倉掾蘇  
良、奏曹史淳于仁、兵曹史瓠今、從掾位張雅（正）

<sup>41</sup> 秦及西漢前期有不少關於「三辨券」的律令規定和券書實物，學界有不少專門的研究成果，如邢義田，〈再論三辨券——讀嶽麓書院藏秦簡札記之四〉，《簡帛》第 14 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頁 29-35；張春龍、大川俊隆、韋山明，〈里耶秦簡刻齒簡研究——兼論嶽麓秦簡《數》中的未解讀簡〉，《文物》2015.3：53-69, 96；陳偉、熊北生，〈睡虎地漢簡中的券與相關文書〉，《文物》2019.12：53-62；曹天江，〈秦遷陵縣的物資出入與計校——以三辨券為線索〉，《簡帛》第 20 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頁 189-226。

<sup>42</sup>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益陽兔子山遺址出土簡牘（三）〉，湖南考古（www.hnkg.com/show\_news.aspx?id=975，2014.12.10）。釋文校訂參見邢義田，〈再論三辨券〉，頁 33-34。

凌文超

☑ 鸞 錄事掾李

☑ 鸞 錄事掾李

☑ 鸞 錄事掾李 (孔木 49 背)<sup>43</sup>

簡 17 正面兩莢之間的「剖分線」明顯，與田家莢常見的剖分線一樣，貫穿文字和合同符號，也是「先寫後劃」（先寫內容，後劃剖分線）。

據背面三行同文內容，簡 17 應為三辨券。簡背左側殘留另莢文字，表明右莢已經剖分，只是因為簡背文字書寫位置有所偏離，導致該行文字因破莢而分屬兩券。簡 17 殘字的遺存也與田家莢中的相關情形類似。同時，正面合同符號未見「同」字右側的「」筆，亦反映右莢當已剖分。

在剖分方面，簡 17 的情況與簡 14 有相近之處，簡 14 左莢完全剖分，簡 17 右莢完全剖分，留下其他兩券尚未破莢。

比較田家莢與漢、晉三辨券實物，它們都符合券莢的基本特徵：「大書中央，中破別之。」「大書中央」的是合同符號（同文符號），田家莢一類的「檢校券」將同文符號書畫在簡的頂端，而簡 14-17 這類的「出入券」則將合同符號書畫在簡的中部。合同符號書畫位置的差異，可能與券書功能的不同有關。「中破別之」則主要體現在剖分線、殘字和同文內容的書寫上，這些在上述券莢中都有或多或少的體現。

---

<sup>43</sup> 侯燦、楊代欣編著，《樓蘭漢文簡紙文書集成》（成都：天地出版社，1999），頁 110-111。釋文修訂參見胡平生，〈木簡出入取予券書制度考〉，《文史》第 36 輯（北京：中華書局，1992），後收入氏著，《胡平生簡牘文物論稿》，頁 52-64。

表五：漢晉三辨券示例

		
<p>③②J6⑥3</p>	<p>③③a 孔木 49</p>	<p>③③b 孔木 49</p>

## 六·竹簡入受荊與田家荊

田家荊的同文符號書畫在簡的頂端，這與一般出入券合同符號書畫在簡的中部有明顯的區別。根據同文符號位置的差異以及書寫內容的不同（是否以「出」「入」起始），可將吳簡中的券荊分為兩大類：一類是田家荊，另一類是「出/入受荊」（簡 15、16）。

### （一）田家荊與竹簡入受荊內容上的對應與歧互

田家荊是大木簡，書寫內容眾多。「出/入受荊」是竹簡，書寫內容單一。在物體形態上看不出兩者有什麼關聯。但是，兩者記錄的內容卻存在一些對應之處。例如，田家荊記錄的主要內容是租稅米、田畝錢、田畝布徵繳的匯總，竹簡入受荊則分別記錄租稅米、田畝錢、田畝布的收入，相關簡例如：

18. 入東鄉嘉禾五年稅米十三<sup>44</sup>斛~~≡~~嘉禾六年二月廿一日茅丘謝蘇關主記梅綜付掾孫儀受（貳·8265）
19. 入東鄉~~嘉~~禾五年田畝錢准〈准〉米十一斛~~≡~~嘉禾六年正月十七日楮丘黃漢關主記梅綜付掾孫儀受（貳·8255）
20. ~~□□~~年田畝布賈准米七斛~~≡~~嘉禾五年十二月廿四日楮丘州吏黃和關丞臬紀付掾孫儀受（伍·3811）

簡 18-20 記錄的內容是稅米以及田畝錢、布折米入倉，與田家荊記錄的實際上是同類物資。

同時，在這類竹簡入受荊中有一些與田家荊存在丘名、人名及身分均對應的簡例（以波浪線標示），他們應為同一人。但是，兩者記錄的米、錢、布數額及交付日期多不對應（以橫線標示）。<sup>45</sup> 茲列幾組如下：

#### 第一組

21. 入東鄉嘉禾五年稅米五斛一斗~~≡~~嘉禾五年十二月廿八日扶丘何禮關丞臬紀付掾孫儀受（貳·8246）
22. ~~≡~~夫丘男子何禮，佃田卅町，凡五十畝，皆二年常限。畝收米一斛二斗，

<sup>44</sup> 「三」，原釋作「二」，據圖版改。

<sup>45</sup> 參見鄧璋光、吳瓊，〈試論「丘」及其相關問題〉，《南京曉莊學院學報》2017.5：35-36。

凡為米六十斛，收布二尺。其米六十斛，六年二月十日付掾孫儀。凡為布二匹二丈，准入米六斛五斗二升……□……畝收錢八十，凡為錢四□（5.109）

據竹簡入受簡 21 的記錄，扶丘何禮於嘉禾五年十二月廿八日將當年稅米「五斛一斗」送交給掾孫儀。然而，田家簡 22 記錄，夫丘（「扶丘」的省寫形式）何禮一共繳納稅米「六十斛」，應當是在嘉禾六年二月十日纔繳納完畢。結合起來分析，簡 21 記錄的似乎可以理解為扶丘何禮多次送繳稅米中的一次。但是，更多的對應簡例並非這樣：

第二組

23. □鄉嘉禾五年稅米卅三斛四斗儻畢≡嘉禾五年十二月九日劉里丘劉芑<sup>46</sup> 關丞□（貳·8238）

24. ≡劉里丘男子劉芑，佃田十九町，凡十二畝，皆二年常限。其三畝旱不收布。定收九畝，畝收米一斛二斗，凡為米十斛八斗，畝收布二尺。其米十斛八斗，五年十二月十三日付倉吏郭勳、馬欽。凡為布一丈八尺，五年十二月八日付庫吏番慎、番宗。其旱田不收錢。其孰田收錢八十，凡為錢七百廿，五年十二月十日付庫吏……。嘉禾六年二月廿日，田戶曹史張惕、趙野校。（5.903）

第三組

25. 入東鄉嘉禾五年稅米六斛≡嘉禾六年二月十八日倉丘謝生關主記梅綜付□（貳·8243）

26. ≡倉丘男子謝生，佃田卅町，凡七十畝，皆二年常限。其一畝旱田不收布。定收六十九畝，為米八十二斛八斗，收布二尺。其米八十二斛八斗，六年二月十日付掾孫儀。凡為布三匹一丈八尺，准入米八斛九斗，六年二月十日付掾孫儀。其旱田不收錢。其孰田收錢畝八十，凡為錢五千五百廿，准五斛，六年二月一日付中倉吏郭勳、馬欽。嘉禾六年二月廿日，田戶曹史張惕、趙野校。（5.585）

據第二組對應簡例，劉里丘劉芑於嘉禾五年十二月十三日將其當年稅米「十斛八斗」繳納完畢（簡 24），然而，就在此前四天，他將嘉禾五年稅米「卅三斛四斗」送交入倉（簡 23），遠遠超過他當年的應繳數額，其中勢必包含了其他人應繳的稅米。至於第三組對應簡例，倉丘謝生在嘉禾六年二月十日就已將其嘉禾五年稅米「八十二斛八斗」繳納完畢（簡 26），然而，八天後，他再次送交當年稅

<sup>46</sup>「芑」，原釋作「笄」，據圖版及對應簡例 5.903 改。

米「六斛」（簡 25）。如果承認田家荊記錄的稅米繳納情況是事實，那麼，竹簡入受荊簡 23、25 所記錄的內容應理解為劉荊、謝生將稅米送交入倉，而且該稅米並不一定是他本人的稅負，畢竟入受荊與田家荊記錄他們送交稅米的數額和日期均差異太大。換言之，簡 23、25 同文符號之後記錄的劉荊、謝生是稅米入倉的運輸者，是否納稅人則難以判定。

不僅稅米交納的情況如此，田畝錢、布准入米也是如此，相關對應簡例如下：

第四組

27. 入東鄉嘉禾五年田畝錢准〈准〉米十一斛 嘉禾六年正月十七日楮丘黃漢關主記梅綜付掾孫儀受（貳·8255）
28. 楮<sup>47</sup>丘男子黃漢，佃田廿二町，凡卅一畝，皆二年常限。其十畝早敗不收布。定收廿一畝，為米廿五斛二斗，畝收布二尺。其米廿五斛二斗，五年十一月六日付三州掾孫儀。凡為布一匹二尺，准入米二斛六斗二升，五年十一月十八日付三州掾孫儀。其孰田畝收錢八十，凡為錢一千六百八十，准入米一斛五斗，五年十一月九日付三州掾孫儀。嘉禾六年二月廿日，田戶曹張惕、趙野校。（5.854）

第五組

29. 田畝布賈准米十八斛盈胃畢 嘉禾五年十一月廿七日資丘男子謝覽<sup>48</sup>（貳·8272）
30. 資丘男子謝覽，佃田十二町，凡十八畝。其一畝早敗不收布。定收十七畝，畝收米一斛二斗，凡為米廿斛四斗，畝收布二尺。其米廿斛四斗，五年十一月十二日付三州掾孫儀。凡為布三丈四尺，准入米二斛一斗六合，五年十二月十日付倉其早其孰田（5.818）

在第四組對應簡例中，楮丘黃漢在嘉禾五年十一月九日就已將其田畝錢准入米「一斛五斗」繳納給三州掾孫儀（簡 28）；然而，兩個多月後，他再次將田畝錢准米「十一斛」交付孫儀（簡 27），且數額遠超其應繳數額。在第五組對應簡例中，資丘男子謝覽在嘉禾五年十二月十日繳納其田畝布准入米「二斛一斗六合」（簡 30），然而，此前的嘉禾五年十一月廿七日他曾送交田畝布賈准米「十八斛」（簡 29），同樣遠超其應繳數額。

<sup>47</sup>「楮」，原釋作「緒」，據圖版及對應簡例貳·8255 改。

<sup>48</sup>「覽」，原釋作「賢」，核對圖版，該字殘缺右半，「臣」「目」可辨識，據圖版及對應簡例 5.818 改。








走馬樓吳簡中，嘉禾四、五年竹簡入受莝遺存很少，且大多殘斷，其中未見與田家莝記錄的米、錢、布繳納內容完全對應的簡例，上述五組丘名、人名對應簡例也是幾乎無不歧互，尤其是第二、四、五組對應簡例，入受莝記錄的納稅額遠超田家莝記錄的應繳額，第三組入受莝記錄的交納日期晚於田家莝記錄的完稅日期，可見這些竹簡入受莝記錄的稅米和田畝錢、布准米應當並非送交者一人的課稅。

## (二) 竹簡入受莝所反映的田租交納方式

據第二至五組對應簡例，竹簡入受莝記錄的送交者、物資不一定是納稅人及其應繳稅。關於入受莝所反映的賦稅交納方式，學界存在三類意見。第一類意見主張「自送」，即納稅人直接向倉庫輸稅。<sup>49</sup> 第二類意見主張「代輸」，如伊藤敏雄先生認為，鄉（吏）擔任賦稅徵收業務，並按邸閣或縣的命令納入倉庫。<sup>50</sup> 第三類意見主張「自送」與「代輸」並存，于振波先生最早提出此說。<sup>51</sup> 近來，鄧瑋光、吳瓊先生通過分析入受莝格式，認為「在入簡中只有同文符前的人名與繳納物間有必然聯繫，同文符後的人名只是運輸者而與繳納物間無必然聯繫」。<sup>52</sup>

吳簡中有不少簡例明確反映賦稅交納「自送」與「代輸」並存。「自送」的簡例如：

31. 入小武陵鄉嘉禾二年帥客棋生限米五斛胄米畢嘉禾二年十月廿五日楮下丘棋生關邸閣董基付三州倉吏鄭黑受（壹·4458）
32. 入廣成鄉嘉禾二年私學潘復限米三斛胄米畢嘉禾二年十二月十日漂丘潘復關邸閣董基付三州倉吏鄭黑受（陸·2067）
33. 入東鄉嘉禾二年縣吏黃諱稅米三斗嘉禾二年十二月廿五日劉里丘黃諱關邸閣董基付三州倉吏鄭黑受（陸·2859）

簡 31-33 這類同文符前後姓名一致の入受莝記錄的是納稅者親自送繳賦稅。另有一類同文符前後姓名不同的入受莝。這類入受莝又可細分為兩種：一種是同姓不同名，如：

<sup>49</sup> 張榮強，〈孫吳「嘉禾吏民田家莝」中的幾個問題〉，頁 301-302。

<sup>50</sup> 伊藤敏雄，〈從嘉禾吏民田家莝看米的交納狀況與鄉、丘〉，《吳簡研究》第 2 輯（武漢：崇文書局，2006），頁 90-138。

<sup>51</sup> 于振波，〈走馬樓吳簡賦稅收支記錄管窺〉，《南都學壇》2009.4：24-29。

<sup>52</sup> 參見鄧瑋光、吳瓊，〈試論「丘」及其相關問題〉，頁 27-38。

34. 入東鄉縣吏鄭湯租米一斛胄畢<sub>三</sub>嘉禾元年十一月九日贛丘鄭熊付三州倉吏谷漢受 中<sup>53</sup> (肆・3133)
35. 入東鄉州吏烝牛租米三斛胄畢<sub>三</sub>嘉禾元年十一月廿日 湛丘烝(?)當付三州倉吏谷漢受中 (肆・3763)
36. 入東鄉縣吏黃香租米三斛胄畢<sub>三</sub>嘉禾元年十一月三日大田丘男子黃巢付三州倉吏谷漢受 中 (肆・3785)

因為同姓的關係，同文符後登記的送繳者不排除是納稅人的親屬。如果他們是同戶之人，就也可以算作是「自送」。另一種則是異姓之人，如：

37. 入 □鄉嘉禾元年州吏黃皓租米二斛一斗<sub>三</sub>嘉禾二年正月十日斬鈴丘吳 署關邸閣董基付三州倉吏谷漢受 (貳・4173)
38. 入東鄉州吏黃暉租米三斛胄畢<sub>三</sub>嘉禾元年十一月廿五日賀丘大男谷宜付三州倉吏谷漢受中 (肆・3796)
39. 入東鄉嘉禾二年吏容固匠限米四斛六斗胄畢<sub>三</sub>嘉禾二年十二月廿五日劉里丘劉伯關邸閣董基付倉吏鄭黑受 (陸・2963)

這類入受蒞還有肆・3193、3750、陸・3979 等，同文符後登記的異姓者與納稅人是同戶之人的可能性比較小。大體上看來，這類同文符前後登記異姓者的入受蒞，同文符之前所記的應是納稅人，之後所記的有很大可能是「代輸」者。

更多的人入受蒞省記同文符之前的姓名，僅記同文符之後送交者的姓名。這類入受蒞所記的送交者實際上很難分辨究竟是「自送」還是「代輸」者。例如：

40. 入西鄉嘉禾二年稅白米八斛五斗<sub>三</sub>嘉禾三年三月十六日東扶丘鄧將關邸閣李嵩付倉吏黃諱史番慮 (貳・366)
41. □嘉禾二年稅米十二斛一斗<sub>三</sub>嘉禾三年三月十六日東扶丘大男鄧將關邸閣李嵩付倉吏黃諱史潘慮 (貳・379)
42. □嘉禾二年佃卒限米四斛<sub>三</sub>嘉禾三年三月十六日東扶丘鄧將關邸閣 □□付倉吏黃諱史 □□ (貳・777)

東扶丘鄧將在嘉禾三年三月十六日一天之內將三種米「稅白米八斛五斗」「稅米十二斛一斗」「佃卒限米四斛」送交入倉。他既交「稅米」，又交「佃卒限米」，甚至「稅米」還以兩種形式分別登記。鄧將似有可能將二、三人的課米送交入倉並分別登記，其中有的應為「代輸」。

<sup>53</sup> 「中」，原闕釋，據圖版補。

不過，這三種米也有可能皆為鄧將的稅負。吳簡中「米」有「白米」與「薺米」之分：

43. 集凡承餘新入吳平斛米合四萬一千七百四斛七斗二升三合

(捌·3031·圖 7-159)

44. 其四萬一千七百二斛八斗七升三合薺米 (捌·3030·圖 7-158)

45. 其一斛八斗五升白米 (捌·3028·圖 7-156)

簡 43-45 屬於同一簡坨，位置相近（在同一簡層依次排列，僅間隔一枚簡）。簡 43 為集計簡，簡 44、45 為分計簡，三者的數值相吻合。由此可見，孫吳在文書行政中將「米」分為「白米」與「薺米」兩大類。

「白米」應為經過選擷而來的顏色潔白、品質較好的大米，如漢代刑徒「白粲」專門從事「坐擇米使正白」的勞役，<sup>54</sup> 吳簡中記錄的「擷白米」（伍·6094），應即選取而來的白米。「薺米」與「白米」相對，乃「赤米」一類質量一般的大米。《國語·吳語》云：「今吳民既罷，而大荒荐饑，市無赤米。」韋昭注：「赤米，米之薺者。」<sup>55</sup> 史載第五倫性節儉，任會稽太守「受俸祿常求赤米，與小吏受等」。<sup>56</sup> 據此，「薺米」應即韋昭所謂「米之薺者」，也就是「赤米」一類品質一般甚至低劣的大米。<sup>57</sup> 東漢二千石官僚俸祿一般供給「白米」，驅走小吏則發放「赤米」「薺米」。

吳簡中登記米時往往以小字的形式特地注出「白米」，而「薺米」一般不再注明，如：

46. 入黃龍三年稅米一百卅二斛六斗 其廿六斛四斗五升白米 中<sup>58</sup> (肆·4735)

47. 入嘉禾元年租米六十五斛九斗五升 其一斛白米 中<sup>59</sup> (柒·1518)

在簡 46、47 中，除去「白米」，剩下的就是「薺米」。至於簡 40、41 所記的「稅白米」與「稅米」應當分別指「白米」與「薺米」。「白米」品質好，有專

<sup>54</sup> 《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2），卷二，〈惠帝紀〉顏師古注，頁 87。

<sup>55</sup> 徐元誥撰，王樹民、沈長雲點校，《國語集解》（北京：中華書局，2002），頁 554-555。

<sup>56</sup> 劉珍等撰，吳樹平校注，《東觀漢記校注》（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卷一六，〈第五倫傳〉，頁 665。

<sup>57</sup> 羅小華、伊強先生認為，「薺米」之「薺」應是「藪」的訛字，可讀為「藪」。「薺米」即傳世文獻中的「糲」，指的是「糙米」。羅小華、伊強，〈「薺米」與「薺席」〉，《簡帛》第 24 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2），頁 199-203。

<sup>58</sup> 「中」，原闕釋，據圖版補。

<sup>59</sup> 「中」，原闕釋，核對圖版，殘存漫漶字痕，據補。

門的用途，單獨保存，因而需要專門記錄；僅記為「稅米」的，一般就是「稅蒺米」。關於簡 42 記錄的「佃卒限米」，「郡佃卒」、「佃卒」在戶籍簿中有登記（肆·531、伍·3757），有的由「縣卒」充任，這類「佃卒」的身分為編戶民。<sup>60</sup> 鄧將一旦充任「佃卒」就需要繳納「佃卒限米」。總之，鄧將可能分別以「白米」「蒺米」繳納其家庭的課稅米，同時繳納其本人擔任「佃卒」的職事課米。簡 40-42 也有可能是鄧將「自送」徵課米的記錄。

又如，結合一些同名簡例，有跡象顯示一些人受蒞可能是「代輸」的記錄：

48. 入[桑]鄉嘉禾二年吏客限米廿斛胄畢[三]嘉禾二年十二月六日露丘子弟謝忠關邸閣董基付三州倉吏鄭黑受（陸·2196）
49. 入桑<sup>61</sup>鄉嘉禾二年吏[烝]昭子弟限米八斛四斗胄畢[三]嘉禾二年十二月十八日[平]樂丘謝忠關邸閣董基付三州倉吏鄭黑受（陸·2116）
50. 入桑鄉嘉禾二年吏烝[昭]<sup>62</sup>子弟限米六斛四斗胄畢[三]嘉禾三年正月六日平樂丘大男謝忠關邸閣董基付倉吏鄭黑受（陸·4055）

據簡 49、50，嘉禾二年平樂丘謝忠為吏烝昭的子弟，繳納「子弟限米」。然而，簡 48 中，「子弟」謝忠當年又送交了「吏客限米」。「子弟限米」與「吏客限米」雖然都是限米，但是，兩者分別為不同身分「子弟」與「吏（帥）客」的徵課。這兩種米在簿書中分別進行統計：

51. ·右廣成鄉[入]元年子弟限米七斛一斗（叁·2701）
52. ·右廣成鄉入元年吏帥客限米卅八斛（叁·2847）
53. ·右桑鄉入三年子弟限米十一斛一斗（叁·2742）
54. ·右桑鄉入三年吏帥客限米廿九斛（叁·1401）

所謂「吏（帥）客限米」，即吏所率領的客應繳的限米。<sup>63</sup> 從竹簡入受蒞的相關記載來看：

55. 入東鄉嘉禾二年州吏陳顏客烝[罔]限米十九斛二斗胄畢[三]嘉禾二年十二月廿五日新成丘烝罔關邸閣董基付三州倉吏鄭黑受（陸·2964）

<sup>60</sup> 凌文超，〈走馬樓吳簡中所見的諸卒〉，《簡帛》第 24 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2），頁 212-215。

<sup>61</sup> 「桑」，原釋作「東」，據圖版改。

<sup>62</sup> 「昭」，原釋作「監」，據圖版改。

<sup>63</sup> 「吏（帥）客」釋義，參見沈剛，《〈長沙走馬樓三國吳簡〉語詞匯釋》（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7），頁 83。

56. 入平鄉嘉禾二年故吏陳同客陳囊限米五斛一斗儻畢<sub>三</sub>嘉禾二年十二月一日寢丘陳囊關邸閣董基付倉吏鄭黑受（陸·2110）

這類「吏客限米」有的「自送」（簡 55、56），有的可能是「代輸」（簡 39、48）。簡 39 中的劉里丘劉伯，在嘉禾四年、五年送繳稅米，其身分為平民男子（貳·8247、4.481），嘉禾二年當也如此，吏帥客固匠應繳的「吏客限米」由平民劉伯代輸。與此相同，子弟謝忠應繳的本是「子弟限米」（參簡 49、50），但在簡 48 中，他送交的是「吏客限米」，也應是幫「吏客」代輸。

不過，我們似乎也有一二理由將簡 48 理解為「自送」的記錄。參考以下簡例：

57. 入樂鄉嘉禾二年吏客子弟限米二斛就畢<sub>三</sub>嘉禾三年四月廿日肥豨丘鄭斗關邸閣董基付三州倉吏鄭黑受（柒·1606）

58. 入廣成鄉嘉禾二年吏帥客子弟限米□斛五斗儻畢<sub>三</sub>嘉禾三年正月九日□丘張囡<sup>64</sup>關邸閣董基付倉吏鄭黑受（柒·4276）

59. 入廣成鄉嘉禾二年故吏謝監客子弟限米四斛□□<sub>三</sub>嘉禾二年十二月四日東□丘謝□關邸閣董基付三州倉吏鄭黑受 中（陸·2207）

簡 57、58 記錄的「吏（帥）客子弟限米」，據簡 59 記錄的「故吏謝監客子弟限米」，應為吏帥客之子弟應繳的限米。「吏（帥）客子弟限米」是歸類於「吏（帥）客限米」還是「子弟限米」呢？吳簡中的「子弟」，一般專稱「吏之子弟」。<sup>65</sup> 這類吏帥客的「子弟」（此子弟或為泛稱，指子侄輩、年輕後輩），其身分是從「吏」而為「（吏之）子弟」，還是從「吏（帥）客」而為「客」呢？目前尚難得出明確的結論。如果「吏（帥）客子弟限米」理解為「子弟限米」或「吏（帥）客限米」皆可（兩者的限米課稅相同），那麼，簡 48 記錄的「子弟謝忠」交付「吏客限米」也有可能是「自送」。

再如，不同籍貫的送交者或許是「代輸」的反映：

60. 入東鄉嘉禾二年稅米廿四斛胄畢<sub>三</sub>嘉禾二年十二月十一日吳昌上□丘烝舉關邸閣董基付三州倉吏鄭黑受（陸·2775）

61. 入東<sup>66</sup>鄉嘉禾二年稅米十七斛四斗胄畢<sub>三</sub>嘉禾二年十二月八日領下丘烝舉關邸閣董基付倉吏鄭黑受（陸·5126）

<sup>64</sup>「囡」，原釋作「憑」，據圖版改。

<sup>65</sup>孟彥弘，〈吳簡所見的「子弟」與孫吳的吏戶制——兼論魏晉的以戶為役之制〉，《魏晉南北朝隋唐史資料》24（2008），後收入氏著，《出土文獻與漢唐典制研究》，頁 68-74。

<sup>66</sup>「東」，原缺釋，據圖版補。

62. 入東鄉嘉禾二年稅米二斛五斗胄畢<sub>三</sub>嘉禾二年十二月十三日領丘丞舉關邸閣董基付三州倉吏鄭黑受（陸·2131）

簡 60 顯示丞舉的籍貫應屬「吳昌」，並非臨湘侯國，吳昌縣民將臨湘侯國東鄉的稅米送交三州倉（這類簡例還有陸·1840、2688、2756、2806、2873、2881、5085），當然有可能是「代輸」。

然而，簡 61、62 又將丞舉與「領下丘」「領丘」連記（這兩丘與「東鄉」對應的簡例還有簡叁·2825、肆·2384、伍·5412）。簡 60-62 分別將丞舉與兩縣不同丘連記，如果不是同名異人（同鄉同名送交者是同一人的可能性較大），又該如何解釋呢？據吳簡記錄：

63. 右四戶，口食十二人，吳昌縣民，以<sub>三</sub>嘉禾二年中移<sub>來</sub>部界佃種，過年十二月廿一日以<sub>占</sub>上戶牒。（陸·1733）

嘉禾二年曾有吳昌縣民流移到臨湘侯國屬鄉耕作，他們一開始還不是臨湘侯國的鄉里編戶民，但是，他們耕種臨湘侯國鄉丘的田地，自然也就需要向臨湘侯國繳納田租。從這個角度看來，簡 60 記錄的「吳昌<sub>上</sub>丘」應當是丞舉的原籍及田廬所在地，<sup>67</sup> 而簡 61、62 記錄的「領下丘」、「領丘」是丞舉流徙到臨湘侯國後的居處和耕作地，三者可能只是記錄的依據不同。按簡 61、62 的記錄，簡 60 似乎也可以理解為在臨湘侯國佃種的吳昌縣民丞舉「自送」稅米。

此外，有的人受蒞在記錄送交者時不記其所處之丘名，而記其較為特殊的職名，如「督軍糧御(?)史」、「書史」：

64. 入<sub>三</sub>鄉<sub>三</sub>里嘉禾元年租米<sub>一</sub>斛<sub>三</sub>嘉禾元年十一月廿一日督軍糧御(?)史勸<sub>關</sub>邸閣郭據付倉吏黃諱<sub>番</sub>慮<sub>受</sub>（貳·384）

65. 入<sub>東</sub>鄉租米卅斛就畢<sub>三</sub>嘉禾元年三月十日書史黃<sub>三</sub>（叁·5647）

66. 入樂鄉黃龍二年早菜租米十六斛<sub>三</sub>嘉禾元年九月十日書史番更付倉吏<sub>三</sub>（叁·2752）

67. <sub>入</sub>都鄉二年所貸嘉禾元年稅禾還米二斛五斗<sub>三</sub>嘉禾二年十一月十二日<sub>取</sub> (?)田丘男子潘更關邸閣李嵩付倉吏<sub>三</sub>（柒·4221）

「督軍糧御(?)史」負責軍糧的轉運和監管。「書史」負責書記等文書事務，包括這類入受蒞的書寫。他們因為職務的關係，都有可能參與田租米的運交。例如，簡 66、67 記錄的同名者「番（潘）更」，簡 66 記作嘉禾元年九月「書史番

<sup>67</sup> 關於吳簡中所見「丘」的學術史回顧，請參見凌文超，〈嘉禾吏民田家蒞研究述評〉，《中國中古史研究》第 7 卷：何謂制度（上海：中西書局，2019），頁 109-113。

(潘)更」，他為樂鄉運交黃龍二年旱案租米；而簡 67 記作嘉禾二年十一月「取(?)田丘男子潘更」，為都鄉運交還貸米。如果承認「番更」與「潘更」有可能是同一人，其中一簡尤其是簡 66 就有可能是「代輸」的記錄。

諸如簡 67 這類與還貸有關的竹簡入受荊，有一二簡例可能與「代輸」有關：

68. 入平鄉還二年所貸嘉禾元子弟限米五斛<sub>三</sub>嘉禾二年十月十七日模鄉東澗丘大男黃能關邸閣李嵩付倉吏黃諱潘慮受(陸·4166) 【注】原簡「元」下脫「年」字。

69. 入桑鄉還二年所貸嘉禾元年子弟限米九斛<sub>三</sub>嘉禾二年十月十四日模鄉□下丘男子胡□關邸閣李嵩付倉吏黃諱潘慮(陸·4170)

在簡 68、69 中，模鄉男子黃能、胡□將平鄉、桑鄉的還貸米送交入倉。他們為模鄉屬民，卻為他鄉送交還貸米，很自然的解釋是，黃能、胡□應為「代輸」者。當然，我們也可以推測黃能、胡□在嘉禾二年將他們的戶籍從平鄉、桑鄉遷移至模鄉，他們將原來在平鄉、桑鄉所貸的子弟限米「自送」入倉，親自還貸。只是，後一種解釋過於繁複和曲折。

總的看來，這類只在同文符號之後記錄送交者姓名的竹簡入受荊，雖然有不少跡象顯示有些人應當是「代輸」者，但是，依然難以排除是「自送」者的可能性。不過，結合第二至五組竹簡入受荊與田家荊對應簡例，以及同文符號前後納稅人與送交人姓、名皆不同的竹簡入受荊進行研判，孫吳臨湘侯國田租繳納存在「代輸」方式是毋庸置疑的。質言之，孫吳臨湘侯國田租繳納「自送」與「代輸」並存。那些親自將田租米、錢、布送繳到倉庫的田家，其「出受荊」與「田家荊」勢必存在內容上的對應關係。只是，筆者在吳簡中尚未找到完全對應的例證。這種情況應當並不常見。倉米入受除了「自送」，還有「代輸」，其送交者不一定是納稅人，與田家並無必然的對應關係。那些記錄「代輸」的竹簡入受荊無法直接反映吏民親自繳納田租的情況，與田家荊記錄的吏民田租不可能存在直接的對應關係，就如同上述第二至五組對應簡例記錄的那樣。由此看來，至少那些記錄「代輸」的「出受荊」並非田家荊直接抄錄的對象。

## 七·竹簡入受荊的形制與功能

走馬樓吳簡竹簡入受荊至少有「出受荊(出券)」(簡 15)和「入受荊(入券)」(簡 16)，其形制和格式與簡 14 兔子山東漢木簡「三辨券」近同(均長

凌文超

約 1 尺，寬約 1 公分）。目前可以確定是「三辨券」的券莛皆為木簡，吳簡中的竹簡入受莛是否也有可能是「三辨券」呢？學界很早就認為存在這種可能性，如侯旭東先生認為，「這些簡（莛）的製作經過應是同時在簡上抄寫二或三份，中間書一『同』或『同文』字，然後剖開，分別由不同的人持以為憑證。持有者除倉吏外，還應包括納米者本人和鄉吏，至於關邸閣在這中間起什麼作用，是否掌握一份憑證，現在還不清楚」。<sup>68</sup> 不過，後來越來越多的學者更傾向於認為是一式左右兩份，所反映的是鄉與倉庫之間物資納入關係。如陳明光先生認為，這種「莛」有一式兩份是肯定的，即倉吏或庫吏持有一份，另一份交給來納人，再由來納人交給鄉吏保管，鄉吏再據此按鄉匯總造冊，製成田家莛。<sup>69</sup> 關尾史郎先生認為，竹簡「納入簡」格式分左右兩行，沿著中央裁斷，分別交由負責稅務者（入簡）與納稅者（出簡）兩方（納稅者由本籍所屬之鄉的勸農掾代表）持有和保管。<sup>70</sup>

### （一）田租類竹簡入受莛與三辨券

吳簡入受莛一式兩份是當前學界的主流意見，究其原因，主要在於竹簡入受莛缺乏明顯的「三辨券」特徵。不像木簡在剖分時容易走樣，竹簡較易被縱向剖分，且較少因剖分失誤而遺留另莛殘字，遺存三莛文字的「中莛」更是十分罕見，也難以辨識。我們之所以考慮竹簡入受莛的性質為「三辨券」，是因為走馬樓吳簡中存在木簡入受莛「中辨券」的簡例，參表六示例④：

70. 新 莛<sup>71</sup> 鄉監丁彪<sup>72</sup> 入嘉禾二年帥客米五十斛胄畢 嘉禾二年十一月十八日付郭浦倉吏劉達<sup>73</sup> 副曹<sup>74</sup>

<sup>68</sup> 侯旭東，〈長沙三國吳簡三州倉吏「入米簿」復原的初步研究〉，《吳簡研究》第 2 輯（武漢：崇文書局，2006），頁 2。

<sup>69</sup> 陳明光，〈走馬樓吳簡所見孫吳官府倉庫賬簿體系試探〉，《中華文史論叢》2009.1：41。

<sup>70</sup> 關尾史郎，〈穀物の貸与と還納をめぐる文書行政システム一斑——東アジア古文書学の起点としての長沙吳簡——〉，角谷常子編，《東アジア木簡学のために》（東京：汲古書院，2014），頁 99-101。

<sup>71</sup> 「新 莛」，原釋作「泛」，據圖版及對應簡例如陸·1663、捌·4521 補、改。

<sup>72</sup> 「彪」，原闕釋，據圖版及熊長雲先生意見補。


<sup>73</sup> 「劉達」，花押，據陸·1665 及對應簡例捌·4521、4522 釋文改。



<sup>74</sup> 該入受莛圖版及釋文，參見宋少華主編，《湖南長沙三國吳簡（六）》（重慶：重慶出版社，2010），頁 24-26。




簡 70 起始處「新 莝」二字被削去左側小半，末尾左側殘存另莝花押「劉」字末尾殘筆（殘存筆畫）、右側花押「劉達」被削去小半（參照簡捌·4521 右側完整的花押字形）。與前述田家莝「中莝」的判定約略相同，此木簡入受莝的左、右兩側因剖分遺留殘字，且左側遺存另莝殘筆，顯示其應為「中莝」。簡 70 記錄的內容、格式與竹簡入受莝大同小異，那麼，竹簡入受莝是否也是「三辨券」呢？



諸如簡 70 一側遺存另莝殘字而另一側因剖分削去部分筆畫的竹簡入受莝，在吳簡中也有出現，參表六示例⑳㉑：

71. 入東鄉嘉禾二年稅米三斛胄畢嘉禾二年十二月廿七日湛丘烝霸關邸閣董基付三州倉吏鄭黑受（陸·2924）

72. 入平鄉嘉禾二年故帥盡子弟限米一斛五斗胄畢嘉禾二年十二月廿六日祀丘吳馬關邸閣董基付三州倉吏鄭黑受（陸·2925）




簡 71 尾部「鄭」字左上遺存另莝「卩」旁殘筆，應為另莝「鄭」的末筆；左側「卩」被削去末筆。簡 72 上下編痕之間簡文左側被削去部分筆跡，簽署「基」字以下，兩行殘字並列（右側為另莝殘字）。這些都可作為「中莝」的判斷依據。這類一行文字因剖分被削去部分筆跡而另一側遺存另莝殘字，以及兩行殘字並列的竹簡入受莝，在吳簡中並不罕見（如貳·166、702，叁·5739，肆·983、1073、3160，陸·2206、2686、4171、4241、5978，柒·4365，捌·3986），試再舉兩例如下（參表六示例㉒㉓）：






73. 入都鄉二年所貸嘉禾元年稅米一斛嘉禾三年三月一日扞梁丘大男程米關邸閣李嵩付倉吏黃諱史潘慮受（柒·128）

74. 斛嘉禾二年十月卅日唐下丘男子毛布關邸閣李嵩付倉吏黃諱史潘慮受（捌·3901）

簡 73、74 上段一行文字完整，下端兩行殘字並列，兩行殘字或因剖分失誤所致。然而，竹簡容易縱向開裂導致難以判斷殘字究竟是「剖分」還是「開裂」所致。因此，上述諸簡雖然有很大的可能性是「中莝」，但還不能完全確證它們就一定是「三辨券」。

判斷竹簡入受莝是「三辨券」，最直觀的依據是尋找到「中莝」，尤其是遺存三莝文字的「中莝」。通過仔細辨認，吳簡中的確存在中行文字完整，左、右兩側遺存另莝字痕且字形大致對應的竹簡入受莝（參表六示例㉔~㉕）：

75. 田畝布賈准米十八斛盈胄畢嘉禾五年十一月廿七日資丘男子謝賢（貳·8272）

76. 入□鄉嘉禾二年稅米……升甌畢嘉禾二年十二月廿五日新成丘州吏陳顏關邸閣董基付三州倉吏鄭黑受（陸·1876）
77. 入平鄉嘉禾二年佃帥限米一斛甌畢嘉禾二年十二月廿一日平湯丘呂狗關邸閣董基付三州倉吏鄭黑受（陸·2035）
78. 入□鄉嘉禾二年稅米十七斛四斗甌畢嘉禾二年十二月八日領下丘烝舉關邸閣董基付倉吏鄭黑受（陸·5126）
79. 入東鄉嘉禾二年稅四斛二斗甌嘉禾二年十二月廿六日□丘黃剗關邸閣董基付倉吏鄭黑受（陸·5189）
80. 入廣成鄉嘉禾二年稅米十斛六斗甌畢嘉禾二年十一月廿七日寇丘番調關邸閣董基付□（玖·5737）
81. □年八月廿日盡丘□□關邸閣董基付倉吏□（壹·369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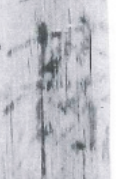

簡 75 頂端右側遺存另荊文字「畝布」的殘筆，同文符上下的左側遺存另荊「畢」「嘉禾五年」等字長橫的殘筆。簡 76 上段左側遺存另荊「嘉」「米」等字長橫的殘筆，下端右側簽署「基」以下遺存另荊部分文字的殘筆。簡 77 頂端右側遺存另荊文字「入平」的殘筆，下端簽署「基」左側遺存另荊簽署的殘筆。簡 78 上段左側遺存另荊「斛」「斗」長橫的殘筆，下端簽署「基」「受」右側遺存另荊簽署的殘筆。簡 79 上段左側遺存另荊文字「鄉」「二」「稅」「斛」等字的殘筆，下端簽署「基」右側遺存另荊簽署的殘筆。簡 80 同文符上下的左側遺存另荊文字的殘筆，下端簽署「基」右側遺存另荊簽署的殘筆。簡 81 簽署「基」右側遺存三點，乃兩橫及撇畫的殘筆，簽署之上簡文左側遺存另荊殘筆。另外，簽署「基」的兩側也偶見另荊簽署殘筆，請參見表六示例④⑥～⑤①，這些也是「三辨券」的直接反映。

簡 75-81 以及一些簽署「基」兩側遺存另荊殘筆，尤其是簡 75、76 兩側殘字與相應簡文（非簽署）對應，可以確證這些田租類竹簡入受荊的形制為「三辨券」。據此，可以說，諸如益陽兔子山東漢簡那樣形制的「三辨券」，至孫吳時期仍然在沿用，而且既有木簡也有竹簡「三辨券」。吳簡竹簡中出現數枚形制較為完整的「君教」竹牘，如簡貳·257、陸·4659、5869，其牘寬約 3.5 公分，完全可以剖分為每枚約 1 公分的左中右三荊。結合這些情形看來，吳簡中田租類竹簡入受荊應是「三辨券」。

表六：入受荊「中荊」示例

 <p>此荊歸下入嘉禾二年此荊米五十斛曹軍</p> <p>䷄</p> <p>嘉禾二年正月十日郭浦倉吏</p>	 <p>嘉禾二年正月十日</p>	 <p>嘉禾二年正月十日</p>	 <p>嘉禾二年正月十日</p>	 <p>嘉禾二年正月十日</p>	 <p>嘉禾二年正月十日</p>
<p>③④</p>	<p>③⑤陸・2924</p>	<p>③⑥陸・2925</p>	<p>③⑦柒・128</p>	<p>③⑧捌・3901</p>	<p>③⑨貳・8272</p>

					
④⑩陸・1876	④⑪陸・2035	④⑫陸・5126	④⑬陸・5189	④⑭玖・5737	④⑮壹・3693

					
④⑥壹·2980	④⑦壹·4402	④⑧壹·7344	④⑨陸·3556	⑤⑩玖·3741	⑤⑪玖·4218

## (二) 田租類竹簡入受莝關涉的責任方

作為「三辨券」的吳簡田租類竹簡入受莝，究竟由哪三個責任方持有？田租類竹簡入受莝登記的責任者一般有「鄉」、「納稅人」、「丘」、「送交者」、「邸閣吏」、「倉吏」。其中，「鄉」和「倉吏」是必備項，在入受莝首尾整齊記錄，即使有的人受莝在起始處未登記「鄉」名，如：

82. 入三年疾足番迎限六斛七斗五升 𠄎 嘉禾元年十月廿五日由澠丘唐禾付三州倉吏谷漢受樂鄉中 (叁·2741)

也會在簡末空白處補注鄉名。「鄉」與「倉」勢必是「出」「入」莝的持有者，這一點學界素無異議。那麼，另一份入受莝由誰持有呢？

首先來看「納稅人」與「送交者」。孫吳臨湘侯國田租繳納「自送」與「代輸」並存，納稅人和送交者有多種記錄樣式，同文符前的納稅人姓名經常闕如，有的甚至闕記同文符後送交者的姓名：

83. 入廣成鄉佃吏謝幼限米二斛就畢 𠄎 嘉禾元年十一月十五日付三州倉吏谷漢受中 (肆·1065)

84. 入廣成鄉……米十斛就畢 𠄎 嘉禾元年十一月十四日付三州倉吏谷漢受 (肆·1239)

在這類情況下，竹簡入受莝記錄的「自送」者或「代輸」者往往難以判定，也難以明確其責任。他們勢必不是賦稅納入過程中不可或缺的责任方，也就無需專門為他們製作券莝。他們受鄉吏的管理，學界一般認為他們將「出券」帶回鄉交給鄉吏保存，可從。

至於「丘」，一般在同文符號之後與送交者連記，也有少數入受莝在同文符號之前與「鄉」連記，例如：

85. 入都鄉懷洩丘嘉禾□年稅米九十二斛七斗≡嘉禾元年二月八日大男潘令關  
邸閣郭□(貳·276)

86. 入都鄉石下丘嘉禾元年稅米九十四斛三斗六升≡嘉禾元年十一月九日大男  
張高關邸閣郭據付倉吏黃諱潘慮受(貳·351)

簡 85、86 這類記錄方式能夠明確稅米所屬之鄉與丘，然而，那些同文符號之後與  
送交者連記的「丘」，則未必是課米所屬之丘。如簡 60 記錄的「吳昌上□丘」是  
蒸舉的原籍，而他送交的稅米來自臨湘侯國東鄉。此類的簡例還有很多，又如：

87. 入東鄉嘉禾二年稅米八斛胄畢≡嘉禾二年十一月十二日吳昌辜丘黃柱關邸  
閣董基付三州倉吏鄭黑受(陸·1840)

88. 入東鄉嘉禾二年稅米十八斛八升胄畢≡嘉禾二年十二月十一日吳昌辜丘蒸  
將關邸閣董基付三州倉吏鄭黑受(陸·2873)

這些與送交者連記的「吳昌上□丘」「吳昌辜丘」並非稅米所屬之丘，而是送交  
者的原籍或居處之地。還有不少人受荊省記「丘」名：<sup>75</sup>

89. 入中鄉嘉禾元年租米卅斛≡嘉禾元年十一月二日男子潘萇關邸閣郭據付倉  
吏黃諱史番慮受(貳·429)

90. 入小武陵鄉三年稅米六斛一斗≡嘉禾元年十一月廿日男□由興付三州倉吏  
谷漢受中(參·2744)

91. 入模鄉嘉禾二年租米十斛一斗四升胄畢≡嘉禾二年十二月九日縣吏區光關  
邸閣董基付三州倉吏鄭黑受(陸·2232)

92. 入東鄉嘉禾二年吏石水客謝□限米四斛胄畢≡嘉禾二年十二月廿六日謝□  
關邸閣董基付三州倉吏鄭黑受(陸·2904)

這類省記「丘」名的人受荊顯示，「丘」在租稅限米入倉過程中，並非不可缺  
的責任方，也無需為他們製作券荊。

最後來看「邸閣吏」。在田租類竹簡入受荊中，「邸閣」也是時而省記，如  
簡 38、66、70、83、84、90。這類省記「邸閣」的人受荊即伊藤敏雄先生歸納的  
四種格式穀物納入簡之「D 形式」，主要在嘉禾元年正月至嘉禾二年正月向三州  
倉納入穀物時使用。<sup>76</sup> 這是否意味著「邸閣吏」也並非不可缺的責任方呢？情

<sup>75</sup> 相關簡例還有：貳·623，參·2857、2876、3581、3613、3671、3744、5661，肆·  
1065、2299、2353、2765、2780、2812、3143、3479、3666、3726、3744、3756、3806，  
柒·1664。

<sup>76</sup> 伊藤敏雄，〈長沙吳簡における米納入狀況再考〉，《歷史研究》(大阪)47(2010)：69-  
97。

況似乎比較複雜。伊藤先生還注意到「D 形式」入受荊末尾往往添加了「中」字，或因未通過邸閣中轉，又或因三州倉吏谷漢自己沒有署名而增加了勾校的需要。<sup>77</sup> 那麼，「邸閣（郎中）」在糧米納入過程中，究竟發揮著怎樣的作用，這就涉及對「關邸閣」的不同理解。

雖然學界對「關邸閣」提出了若干不同的意見，但近年來已不再將「關邸閣」視作一個專名，而是將「關」理解為動詞，將「邸閣（郎中）」理解為職名。<sup>78</sup> 至於動詞「關」的具體含義，主要有兩類意見：一類理解為「由」「經由」，<sup>79</sup> 即租稅限米等經由邸閣（吏），再轉交入倉。另一類理解為「關白」，<sup>80</sup> 即租稅限米入倉過程中需要通知邸閣吏。

如果邸閣（吏）承擔實際的倉米轉運任務，就應是不可缺少的中轉環節。然而，「D 形式」入受荊表明「關邸閣」這一環節有時是可以省略的（有時通過事後檢校並注記「中」字進行彌補）。類似的情況又見於嘉禾元年、二年品市布的徵調。在嘉禾元年品市布入庫過程中，一開始存在「丞義關」（七月十日）、「關丞祁」（七月十日至八月一日）的環節，但此後品市布入受荊或僅記「關丞」而不簽名，或連「關丞」也省記了。在嘉禾二年品市布徵調過程中，主要在嘉禾二年九月、十月、十二月入受荊上出現「丞弁關」的簽署，<sup>81</sup> 其他時段則省記。由此可見，臨湘侯國丞「祁」及其屬吏「義」「弁」只是間斷地參與品市布的徵調，可能主要負責監督、檢校工作，而不是實際的轉運工作。<sup>82</sup> 倉米入受荊記錄的「關邸閣」應當也是如此，這在吳簡中有具體的反映：

93. 中邸閣李嵩、倉吏李金荊誤為稅米入（陸·3285）

94. 邸閣李嵩、吏李金荊誤為郵卒限米（捌·3776）

<sup>77</sup> 伊藤敏雄，〈長沙吳簡中的朱痕和「中」再考〉，長沙簡牘博物館編，《長沙簡帛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上海：中西書局，2017），頁 348-371。

<sup>78</sup> 「關邸閣」的不同理解，詳參沈剛，《《長沙走馬樓三國吳簡》語詞匯釋》，頁 98-101。

<sup>79</sup> 關尾史郎，〈吏民田家荊の性格と機能に関する一試論〉，頁 3-15；邢義田，〈漢至三國公文書中的簽署〉，《文史》2012.3，後收入氏著，《今塵集——秦漢時代的簡牘、畫像與文化流播》（上海：中西書局，2019），上冊，頁 283。

<sup>80</sup> 王素著，市來弘志譯，〈中日における長沙吳簡研究の現段階〉，《長沙吳簡研究報告》第 3 集（新潟：新高速印刷株式会社，2007），頁 73。

<sup>81</sup> 「丞弁關」，原釋作「丞弁」，詳細校訂分析參見凌文超，〈走馬樓吳簡中的簽署、省校和勾畫符號舉隅〉，《中華文史論叢》2017.1：144-160。

<sup>82</sup> 凌文超，〈孫吳嘉禾元年品市布入受簿綜合整理與研究〉，《出土文獻研究》第 17 輯（上海：中西書局，2018），頁 355-358。

簡 93、94 反映出邸閣吏李嵩、倉吏李金需要對倉米入受荊的準確性負責。如果倉米入受荊存在錯誤，在日後的勾校中會明確是哪位邸閣吏與倉吏的責任。邸閣吏與倉吏在倉米入受過程中存在連帶責任：

95. 其十五斛三斗七升付三州倉，關邸閣董基，吏鄭黑受。 [中] (壹·3107)

96. 其八十二斛八斗九升付州中倉，關邸閣李嵩，吏黃諱、潘慮受。 [中] (壹·3120)

諸如簡 95、96 這樣的統計簡例還有很多（如簡壹·3047、3106、3207、3368、3428、3697）。這類簡首先記錄了交付三州倉、州中倉米的數量，然後具體記錄經手者「邸閣吏」與「倉吏」姓名。倉吏實際負責米的接受，邸閣吏應當主要負責監督與檢校，文書錯訛的主要責任人也應是邸閣吏。「邸閣吏」有時根據實際需要，改由「丞」（簡 20、21、23）、「主記」（簡 18、19、25、27）負責其事，有時甚至省去。從整體上看來，「邸閣吏」與「倉吏」是倉米入受過程中連為一體的責任方，似乎沒有必要為他們分別製作券荊。所謂「關邸閣」、「倉吏受」，應當不是米經由邸閣吏之手轉交倉吏接受，而是皆由送交者將倉米入倉。只是，在入倉之時送交者需要先將「三辨券」呈送、關白「邸閣吏」；經「邸閣吏」簽署後，送交者再持該「三辨券」在「倉吏」的指示下將米入倉；「倉吏」完成簽署，入受荊生效，成為鄉、倉之間入米的憑證。

「邸閣吏」與「倉吏」共同持有一份入受荊，如果此說不誤，那麼，還有一份入受荊需要尋其歸屬。吳簡中有這樣一枚特殊的入受荊：

97. 入 [口] 鄉嘉禾二年故吏謝碁子弟限米七斛 [徇] [畢] 嘉禾二年十二月廿九日上和丘謝通關邸閣董基付三州倉吏鄭黑受（陸·2099） 【注】中段右側書「富送縣」三字，第二次書寫。

簡 97 簽署「基」左側被削去部分筆跡，右側遺存另荊簽署「基」字兩橫殘筆，顯示其為「中辨券」。同文符右下書寫三字，原釋作「富送縣」，然而，首字「一」上不止一筆，並非「、」畫，而且「口」上無「一」筆，據字形當改釋作「當」。「當送縣」三字墨跡稍淡，但其字形看不出與簡文有明顯的差異，應當是書手有意在「中辨券」右側注明該券「當送縣」。秦漢《金布律》規定「上券中辨其縣廷」，<sup>83</sup>

<sup>83</sup> 陳松長主編，《嶽麓書院藏秦簡（肆）》（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15），頁 108。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金布律》作「上中辨其廷」，張家山二四七號漢墓竹簡整理小組，《張家山漢墓竹簡〔二四七號墓〕（釋文修訂本）》（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頁 67。



秦《田律》亦規定：「中辨臧（藏）縣廷。」<sup>84</sup> 里耶秦簡 8-1452 記錄倉守在出西廡稻、案時，「今上出中辨券廿九」；<sup>85</sup> 睡虎地漢簡記錄的「出中辨券一」（簡 10）、「謹上出中辨券一」（簡 18），<sup>86</sup> 應當也是將中辨券上呈縣廷。孫吳時期應當仍在遵循這一行政程式。該「中辨券」在破荊時為了保全此三字，導致剖分位置明顯偏右，以致右側遺存較多的空白，且遺存另荊簽署「基」字的殘筆。「當送縣」應當並非「第二次書寫」，而是書手在書寫荊文時一併寫就。簡 97 應可作為田租類竹簡入受荊「中辨券」提交縣廷的直接證據。

又如，前引簡 70 為「中辨券」，記錄新茨鄉監丁彪將（吏）帥客（限）米入付郭浦倉（其間未見「關邸閣」環節），但在簡末注明「副曹」，應當是將「中辨券」作為「副本」提交給安成縣倉曹，<sup>87</sup> 作為檢校的依據。孫吳時期基本上承襲了秦漢以來郡縣「官」「曹」並立的格局，<sup>88</sup> 「倉曹」對「倉（官）」事務仍有監管之責，例如：

98. 從掾位劉欽叩頭死罪白：謹達所出二年稅禾給貸民為三年種糧，謹羅列

人名為簿如牒，請以付曹拘校，欽惶怖叩頭死罪死罪

詣 倉<sup>89</sup> 曹  
八 月 四 日 白

（肆·3904①）

99. 領用三年郭浦倉吏劉欽鹽賈行錢一萬七千（伍·1853）

<sup>84</sup> 陳松長，〈《嶽麓書院藏秦簡（肆）》〉，頁 105。

<sup>85</sup> 本文所引里耶秦簡，未特別標注者，均出自：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里耶秦簡》（壹）（貳）（北京：文物出版社，2012、2017）；陳偉主編，《里耶秦簡牘校釋》第 1、2 卷（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12、2018）。僅標出簡號。

<sup>86</sup> 陳偉、熊北生，〈睡虎地漢簡中的券與相關文書〉，頁 58。

<sup>87</sup> 關於簡牘文書副本的系統研究，請參見邢義田，〈漢代簡牘公文書的正本、副本、草稿和簽署問題〉，《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82.4 (2011)，後收入氏著，《今塵集》，頁 227-254。新茨鄉為安成縣屬鄉，參見熊曲，〈走馬樓吳簡中的市布及相關問題〉，《中國中古史研究》第 9 卷：吳簡（上海：中西書局，2021），頁 129-145。走馬樓吳簡中有不少安成縣文書，且有一枚封檢，上書「長沙安成錄簿筭」（J22-3-2660），原繫在安成縣發往長沙郡有關部門的盛裝文書的竹筭上。簡 70 即屬於其中的文書簡。

<sup>88</sup> 新近研究請參見郭洪伯，〈稗官與諸曹——秦漢基層機構的部門設置〉，《簡帛研究》2013（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4），頁 101-127；孫聞博，〈秦縣的列曹與諸官——從《洪範五行傳》一則佚文說起〉，《簡帛》第 11 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頁 75-87。

<sup>89</sup> 「倉」，原釋作「金」，據圖版改。

從掾位劉欽（後任郭浦倉吏，參簡 99）將郭浦倉吏劉達（參簡 70）出貨種糧的簿書提交給倉曹「拘校」。這與簡 70 將中辨券「副曹」應是同類做法。

孫吳時期，倉曹對邸閣吏、倉吏及倉米事務等有監管之責，如：

100. 倉曹言：邸閣馬維、倉吏武河遺（？）玉（？）官印從科俗（？）  
四月四日倉曹史吳王白（柒·1441）
101. 草言：移州中、三州李、董二邸閣料四年所白入租稅襍米事  
倉曹史趙野白（柒·3093）
102. 草言：被督諸縣倉、郡倉邸閣兼丞應縣問事  
正月十五日右倉曹史趙野白（柒·4481）
103. 草告府：諸縣倉吏、邸閣所領襍起訖米事  
十一月十五日兼倉曹史白（柒·4496）
104. 右倉曹史烝堂白州中倉吏黃諱、潘慮列起嘉禾元年正月一日訖三月卅日旦簿  
（壹·2039+壹·1773）<sup>90</sup>

據簡 100 記錄，邸閣吏與倉吏非法用印，被倉曹糾舉上報。簡 101-104 顯示，倉曹負責邸閣吏、倉吏的文書事務的轉呈和上報。由此看來，在倉米入受過程中形成的「三辨券」，也應提交一份給倉曹或者相應的監管機構，相當於秦漢律規定的「上中辨其廷」。

總之，根據田租類竹簡入受筭的內容和形制，這類入受筭的性質也為「三辨券」，參照兔子山東漢木簡「出入券」格式，其「左券（筭）」為「出券」，由「鄉」持有；其「右券（筭）」為「入券」，由「倉」持有（實際上可能是「邸閣吏」或「丞」、「主記」與「倉吏」共同持有）；其「中辨券（中筭）」提交給倉曹或縣廷監管機構持有，以供檢校。只是，在日常行政當中，左、中、右筭的歸屬並未嚴格按規定呈送。吳簡中的入受筭以「入券」（中筭、右筭）為主，但也零星雜有「出券」（出受筭、左筭，如簡 15）。<sup>91</sup> 在實際行政中，出現券筭

<sup>90</sup> 兩簡編連參見谷口建速，《長沙走馬樓吳簡の研究：倉庫関連簿よりみる孫吳政権の地方財政》（東京：早稲田大学出版部，2016），頁 44。

<sup>91</sup> 走馬樓吳簡竹簡的券筭基本上是「入券」，夾雜了少量的「出券」，例如：壹·4451、4452、7504，貳·368、5709、6156、8207，參·3584、5651、5652、5677、5806、5807，肆·1038、1079、1081、1254、1614、2317、3817、4002、4005、4087、4320、4321、4325、4331、4348、4349、4371，伍·94、95、205、242、279、3425，陸·2299、2302、2306、2312、2313、2316、2317、2320、2322、2429、2430、3041、3045、4354、4358、4360、4367、4370、4372、4378、4379、4383、4873，柒·117、126、134、139、2891、3105，玖·99。

歸屬失誤，應當是比較常見的現象。從吳簡中出現各部門的簿書來看，田租類竹簡入受荊應當不是倉官持有的「右荊」，理論上應為倉官提交給縣廷倉曹或相關機構的「中辨券」。

## 八·田家荊的行政功能

田租類竹簡入受荊（出入券）與田家荊皆為「三辨券」，所記錄的主要內容又皆為田租交納，在倉米入受過程中，邸閣吏經常參與其中，還要「上中辨其廷」，接受倉曹等機構的監管。在如此嚴密的行政程式之下，為何還要針對幾乎相同的行政事務不厭其煩地製作兩類「三辨券」呢？

從兩類「三辨券」所涉諸方來看，田租類竹簡入受荊涉及「鄉（官）」（送交者、鄉吏）、「倉（官）」（邸閣吏、倉吏）以及「倉曹」（或相關監管機構），主要記錄諸鄉將田租納入倉庫。倉曹或相關監管部門監督的是納入倉庫的田租種類、數量等情況。因送交者不一定是納稅人，出入券與田家（納稅人）並無必然的一一對應關係。僅僅依據出入券，官方無法全面掌握田家耕種的田畝數量以及是否完稅等資訊。因此，孫吳官方還需要製作一份能夠體現田家完稅的憑證，該憑證就是「田家荊」。

「田家荊」一式三份，分別由田家、鄉、田戶（經用）曹持有，以簡 28 為例，即黃漢、東鄉、田戶曹。「入受荊」與「田家荊」所涉諸方存在交叉重疊，即「鄉」不僅保管「出受荊」，也持有「田家荊」。之所以出現這種情況，是因為鄉部既是田租等賦稅送交的管理者，又是田家荊的製作者。

田租入受「自送」與「代輸」並存，僅僅通過入受荊的記錄，很難判斷其登記的吏民究竟是「自送」者還是「代輸」者，即使對於邸閣吏、倉吏乃至倉曹史而言也莫不如此，鄉丘田租送交的具體資訊應當掌握在鄉吏（勸農掾）手中。吳簡中有很多相關的事例反映鄉勸農掾是財稅物資送繳的管理者。例如，桑鄉調皮由鄉吏（勸農掾）劉平負責送交入庫：<sup>92</sup>

<sup>92</sup> 凌文超，〈走馬樓吳簡庫皮帳簿整理與研究〉，《北大史學》第 16 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後收入氏著，《走馬樓吳簡采集簿書整理與研究》（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5），頁 397-423。

凌文超

105. 入桑鄉口算鹿皮冊二枚 嘉禾二年正月七日鄉吏劉平付庫吏殷連受 (貳·8879)
106. 入桑鄉皮一枚 嘉禾二年正月十八日鄉<sup>93</sup> 吏劉平<sup>94</sup> 付庫吏殷連 (貳·8884)
107. 入桑鄉羊皮二枚 嘉禾二年二月十七日鄉吏劉卒(?)<sup>95</sup> 付庫□□連受 (貳·8913)
108. 入桑鄉嘉禾元年鹿皮五枚 嘉禾二年二月廿二日勸農掾劉平付庫吏殷連受 (貳·8883) 【注】「庫」下脫「吏」字。
- 桑鄉調布入受蒞中也多見勸農掾劉平負責納布入庫：<sup>96</sup>
109. 入桑鄉布二匹 嘉禾元年八月十九日鄉吏劉平付庫吏殷連受 (陸·5674)
110. 入桑鄉勸農掾劉平布六匹 嘉禾元年八月 (陸·5774)
111. 入桑鄉吏劉平布二匹三丈七尺 嘉禾元年九月 (陸·5773)
112. 入桑鄉布四匹 嘉禾元年十二月四日勸農掾劉平<sup>97</sup> 付庫掾<sup>98</sup> 殷連受 (陸·5661)
- 倉米入受蒞的記錄也是如此：
113. 出桑鄉嘉禾元年租米三斛<sup>其一石佃吏米 其二石租米</sup> 嘉禾二年四月十六日鄉吏劉平付夫與丘男子黃困守 (陸·2299)
114. 入桑鄉嘉禾元年租米六斛 嘉禾二年四月十六日鄉吏劉平付何丘男子由改守錄，折咸改自備 (陸·2435)
115. 入桑<sup>99</sup> 鄉嘉禾元年租禾十九斛 嘉禾二年四月十六日鄉吏劉平付夫與丘男子黃困守錄，折咸困自備 (陸·4355)
116. 入桑鄉嘉禾元年佃吏限禾五斛 嘉禾元年四月十六日勸農掾劉平<sup>100</sup> 付桐丘男子李馬守錄，折咸馬自備 (陸·4376)

<sup>93</sup> 「鄉」，原闕釋，今據圖版及文例補。

<sup>94</sup> 「平」，原闕釋，今據圖版及文例補。

<sup>95</sup> 「卒(?)」，核對圖版，「卒」「平」形近易訛，應作「平」字。

<sup>96</sup> 凌文超，〈孫吳嘉禾元年品市布入受簿綜合整理與研究〉，頁334-391。

<sup>97</sup> 「劉平」，原闕釋，今據圖版補。

<sup>98</sup> 「掾」，原釋作「吏」，今據圖版改。

<sup>99</sup> 「桑」，原釋作「東」，據圖版改。

<sup>100</sup> 「劉平」，原闕釋，據圖版補。

桑鄉應繳納的租米、限禾等本應送交入倉，但鄉吏（勸農掾）劉平並未安排輸送，而是交給吏民守護、保管。<sup>101</sup> 上述種種情形，都是桑鄉勸農掾劉平在嘉禾元年、二年負責財稅徵繳的證據。

從整體上看來，賦稅徵繳無論是「自送」還是「代輸」，都應當在鄉（勸農掾）的直接管理之下。具體而言，田家繳納田租，首先需要與鄉部取得聯繫，領取「出入券」。田租的送繳，或由田家自送，或由他人代輸。倉庫吏收受田租後在出入券上簽署並破莝，「入受莝」（入券、右莝）在倉、庫匯總，編連為冊；「出受莝」（出券、左莝）則由田家或送交者持還鄉部，交給鄉吏；另一份「入受莝」（入券、中莝）則提交給倉曹等監管機構檢校。「出入券」（出/入受莝）在本質上體現的是鄉部與倉庫之間物資輸送關係。<sup>102</sup>

鄉部又是田家莝的編製者，如其標題簡（簡 1-4）明確記錄田家莝由鄉部「謹列」。以學界復原的鄉戶口簿籍為依據，根據人名、鄉里與鄉丘對應關係，我們可以將嘉禾四年或五年小武陵鄉、廣成鄉、中鄉田家莝集成起來，並且從中發現：同鄉田家莝存在一些共同特徵，但不同年、鄉田家莝之間存在一些明顯的差異。例如：嘉禾四年小武陵鄉田家莝佃田皆記作「田○町」，而嘉禾五年小武陵鄉田家莝皆記作「佃田○町」；嘉禾五年小武陵鄉田家莝檢校者皆為「田戶曹史張惕」，而當年廣成鄉田家莝皆由「田戶曹史張惕、趙野校」；嘉禾四年中鄉田家莝檢校日期為「嘉禾五年三月三日」，而當年小武陵鄉田家莝檢校日期為「嘉禾五年三月十日」。各鄉田家莝由若干寫手書寫，甚至同鄉丘田家莝往往存在不同的筆跡，書寫者應當是聚集在一起製作鄉田家莝，並未分丘安排專人書寫。同年同鄉田家莝的正文和田戶曹史之姓由多人書寫，田戶曹史之名則由一人簽署；不同鄉田家莝之間，田戶曹史簽名的字形存在比較明顯的差異。由此看來，孫吳臨湘侯國按各鄉（部）田家莝簿書分配檢校者，且由實際檢校者在莝冊

<sup>101</sup> 參見郭慧瓊，〈走馬樓吳簡所見「守錄簡」整理與研究——兼論孫吳基層賦稅的轉運方式〉，《中國中古史研究》第9卷，頁65-90。

<sup>102</sup> 據吳簡記錄，一個勸農掾多兼管兩鄉，為一個勸農掾部。兩鄉應當是位置相鄰的固定組合，如都鄉和中鄉、廣成鄉和平鄉、桑鄉和樂鄉、小武陵鄉和西鄉。參見安部聡一郎，〈典田掾・勸農掾の職掌と郷——長沙吳簡中所見「戶品出錢」簡よりみる〉，伊藤敏雄、窪添慶文、關尾史郎編，《湖南出土簡牘とその社會》（東京：汲古書院，2015），中譯本見氏著，劉峰譯，〈典田掾、勸農掾の職掌與郷——對長沙吳簡中所見「戶品出錢」簡的分析〉，《簡帛研究》2015 秋冬卷（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5），頁238-256；凌文超，〈新見「勸農掾料核軍吏父兄子弟木牘文書」補釋〉，《中國中古史集刊》第3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7），頁68-72。

中從頭至尾簽名（或代簽），以明確權責，維護簽署的效力。<sup>103</sup>再考慮到田戶（經用）曹並不直接掌握田家送繳田租的具體情況，而鄉部不但保管戶籍正本，而且掌握吏民、部曲佃種田畝的資訊，<sup>104</sup>還負責田租送繳的管理，並持有一份田租類出受荊，凡此種種跡象顯示，田家荊應由鄉部製作。

雖然鄉部既持有「出入券」，又持有「田家荊」，但是，在兩類「三辨券」行政過程中，鄉部所起的作用並不相同。在「出入券」中，鄉部是吏民田家財稅物資輸送納入倉庫的管理者。而「田家荊」不僅是鄉（部）代表官方為吏民田家開具的完稅憑證，還涉及田租米、錢、布送繳倉、庫等情況，從整體上看來，所體現的是官與民之間田租繳納關係。田戶（經用）曹檢校的則是整個田租繳納的情況。相比「出入券」體現的物資輸送關係，「田家荊」擔負著更多的功能，歸納起來，主要有三：一是田家田租的完稅憑證。田家荊詳細登記田家佃田數量以及旱、熟田租稅納入倉庫等具體情況，是否完稅一目了然。參照兔子山東漢簡「三辨券」的「出券」，田家荊的左荊應歸田家持有。田家荊中「左荊」較少，也可反映這一點（參見附錄一）。

二是物資輸納憑證。田家田租的徵繳，以及將田租運至倉庫，主要由鄉部負責管理。鄉部製作的田家荊將田租的付受情況記錄清楚，起到了田家、鄉部、倉庫三方田租交割憑證的作用，又為田戶曹的檢校提供了依據。

三是對帳功能。鄉部在出入券之外，另外按田家逐一製作田家荊，所登記的內容歸根究柢仍然是田租的繳納。這樣官方就擁有了記錄送交者（含田家本人）輸送田租的「入受荊」和記錄「田家」完繳田租的「田家荊」。兩份荊冊登記內容相同，但登記方式有別：入受荊是田租自送或代輸至倉、庫的記錄，而田家荊是單個田家田租繳納的記錄，從而方便田戶（經用）曹對帳和檢校。

參照吳簡「入受荊」仍然遵循秦漢「上券中辨其縣廷」的程式，「田家荊」之中荊應當也是提交給縣廷田戶（經用）曹史，右荊則保留在鄉部。從附錄一所列比較明確的同文符號的分類情況來看，田家荊左荊能確認的很少（據「同」字左側的「丨」），右荊則最多（據「同」字右側的「丨」），至於中荊，其同文

<sup>103</sup> 具體分析詳見凌文超，〈田家荊分類集成及數值、簽署問題〉，《出土文獻研究》第20輯（上海：中西書局，2021），頁453-520。

<sup>104</sup> 鄧璋光，〈走馬樓吳簡萊田簡的復原與研究〉，《出土文獻》2020.1：115-134；熊曲，〈走馬樓吳簡嘉禾五年諸鄉田頃畝收米鄉住簿研究〉，《簡帛研究》2020春夏卷（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20），頁284-297。按「鄉住簿」應改釋為「鄉作簿」。

符號的完整形式應由若干橫線「一」與「文」字殘筆構成，據此推定的田家荊中荊仍然不少（參見附錄一）。不僅如此，田家荊的同文符號時而簡省「文」字，僅由若干橫線「一」構成。「入受荊」上的同文符號也是如此，常簡省為一條（簡壹·3202、3221、3244）或若干條橫線「一」（簡壹·3210、3212、3213）。相比左、右荊，這類同文符號的田家荊為中荊的可能性更高一些。如果將這種情況估計進來，現存田家荊中的中荊就可能要多於右荊。換言之，走馬樓吳簡中的田家荊理論上應當是「田戶（經用）曹」持有的那份「中辨券」。

田家荊之所以由「田戶（經用）曹」負責檢校，是因為田家田租繳納與吏民身分、田畝類型及早熟、倉庫收受直接相關。田曹掌握田籍，戶曹掌握戶籍，經用曹負責經常用度，與庫等機構關係密切（參簡貳·4311、叁·253、伍·3755、3759）。由田曹、戶曹與經用曹選派曹史聯合檢校，<sup>105</sup>如趙野一度任「（部曲）田曹史」「（兼/右）倉曹史」，張惕一度任「（兼）戶曹（別主）史」，陳通一度任「經用曹史（掾）」（參見表七），他們對田曹、戶曹、經用曹以及倉、庫的情況相當熟悉，這有利於他們相互配合對整個田租徵繳環節進行系統監管和檢校，從而更加準確地掌握田家繳稅以及倉、庫收受田租的情況，防止吏民、鄉部、倉庫徇私舞弊，確保田租的順利徵收。

<sup>105</sup> 吳簡中由兩曹人員聯合辦公比較常見，如「右倉田曹」（壹·1641、貳·6765）、「兵戶曹」（伍·3326）、「金戶曹」（柒·2951、2953）。嘉禾二年，由「右倉田曹」負責「貧民貸食米種」（陸·2516①），具體處理相關事務的有「右倉曹史烝□、田曹掾孟蕊」（陸·495）。嘉禾四年田家荊由「田戶經用曹史趙野、張惕、陳通校」，「田戶經用曹史」常省寫作「田戶曹史」或「田曹史」。嘉禾五年，經用曹史陳通很少參與田家荊檢校，因此，檢校者職名一般記作「田戶曹史」，也常省寫為「田曹史」或「戶曹史」。嘉禾四、五兩年田家荊檢校者職名未見省寫作「經用曹史」的例子。從其省寫的情況看，主要是為了書寫簡便。

表七：趙野、張惕、陳通任職情況

姓名	吏職	簡號
趙野	倉曹史	柒・3093、4495
	右倉曹史	柒・4481、4507 <sup>106</sup>
	兼倉曹史	柒・2391、2951 <sup>107</sup> 、2953? <sup>108</sup>
	田曹掾小史	柒・574
	田曹史	柒・577
	兼部曲田曹史	柒・4255 <sup>109</sup> 、4458
張惕	戶曹史	叁・3844、陸・624（嘉禾三年）、1890、柒・2979、3030
	兼戶曹史	柒・2969、3100、3174、3177、4656
	兼戶曹掾	柒・3181
	兼戶曹別主史	柒・2900
陳通	經用曹掾	伍・3451 <sup>110</sup>
	經用曹史	貳・4311 <sup>111</sup> 、叁・253、陸・736、738
	司虞□（曹）史	貳・6816

## 九・餘論

田家荊的同文符號、剖分線、殘字、同文荊以及可辨識的中荊等遺存形態表明，田家荊符合「大書中央，中破別之」的券荊特徵。同文符號的橫筆橫跨左、中、右三荊，「同」字兩側的筆畫「丨」和「丿」有助於識別左、右荊，兩個「文」字預作破荊、騎縫之用；券荊兩側的「剖分線」，具有剖分導向的功能；因破荊失誤而削去或遺存另荊的「殘字」是反映破荊的直接證據；特別是左、右

<sup>106</sup> 「倉」，原釋作「金」，據圖版改。

<sup>107</sup> 「倉」，原釋作「金戶」，據圖版改。

<sup>108</sup> 「倉」，原釋作「金戶」，核對圖版，字跡漫漶，難以辨識，疑作「倉」。

<sup>109</sup> 「曲」，原釋作「典」，據圖版及專名改。

<sup>110</sup> 「經用」，原闕釋，據圖版補。

<sup>111</sup> 「經用」，原闕釋，據圖版補。



同文莝不能契合等，體現出田家莝應是經過兩次破莝生成的一式三份的「三辨券」。其形制特徵與漢晉時期券莝的形態基本相同。

田家莝與入受莝的行政功能不同。入受莝應當也是「三辨券」，作為「出入券」，反映的是管理運送者的鄉部與倉庫之間物資收受的關係，作為物資送交憑證使用，鄉部持「出券」（左莝、出受莝），而倉庫持「入券」（右莝、入受莝），另一「入券」（中莝、入受莝）提交給縣廷監管部門如倉曹進行檢校。

田家莝反映的是鄉部與田家、田戶（經用）曹三方的關係。待民戶或僦人將賦稅送交完畢後，鄉部代表官方，參照「出受莝」，為吏民戶逐一製作田家莝（左莝），<sup>112</sup> 按丘詳細記錄每戶田家田租完納、送繳至倉庫的具體情形，鄉部保存右莝，並將中莝提交給田戶（經用）曹史檢校。田戶（經用）曹史依據倉曹等監管機構保管的「入券」（中莝、入受莝），對各鄉部田家莝進行檢校。<sup>113</sup> 田家莝兼具三大功能：田家的完稅憑證、物資輸納憑證和對帳功能。「入受莝」與「田家莝」的並存，兩本帳的存在，有利於防止鄉部、倉庫做假帳和監守自盜。

最後就田家莝是否為租佃契約提出我們的意見。田家莝雖然記錄了「佃田」（簡 22、24、26、28），但是，此「佃田」與租佃無關。<sup>114</sup> 正如侯旭東先生所指出的，秦漢三國時期「佃」尚無作「租佃」的用法，這裡的「佃田」應作「治田」「耕作田地」解，並不表示從官府租佃了若干畝田。<sup>115</sup> 茲為此說增加一二早期證據。《孟子·萬章下》曰：「耕者之所獲，一夫百畝。」趙岐章句：「一夫一婦，佃田百畝。」<sup>116</sup> 趙岐章句以「佃」釋「耕」，這裡的「佃田」並不意

<sup>112</sup> 在製作田家莝時，「出受莝」記錄的運繳物資被具體分拆到各個田家，這容易導致單枚田家莝的數值產生誤差。

<sup>113</sup> 田戶曹依據「入券」檢校田家莝時，需要按照日期將田家莝中相關民戶數值合併起來，再進行對帳。對帳時重在檢查「入受莝」記錄的運繳物資數量與若干田家莝數值的合計數量是否吻合。在這種情形之下，首先需要確保的是相關田家莝合計數量的準確性，其次纔是單枚田家莝分割資料的準確性。即使單枚田家莝記錄的資料不夠準確，只要相關田家莝數值的合計數量與「入受莝」所記相同，也就意味著相應的田租已經納入倉庫。這或許是田家莝中數值存在大量錯訛的根本原因。

<sup>114</sup> 學界分別將田家的「佃田」理解為租佃官家田地，或以屯田模式組織的國家「營田」，或百姓耕種的私田（民田）。學術史回顧與總結，請參見凌文超，〈嘉禾吏民田家莝研究述評〉，頁 113。

<sup>115</sup> 侯旭東，〈走馬樓竹簡的限米與田畝記錄——從「田」的類型與納「米」類型的關係說起〉，《吳簡研究》第 2 輯，頁 164。

<sup>116</sup> 《孟子》（收入鄭玄等注，《十三經古注》第 10 冊，北京：中華書局，2014），卷一〇，〈萬章章句下〉，頁 2126。

味著租佃關係。又華覈上疏孫皓稱：孫吳調役頻繁，侵奪農時，導致民眾「委舍佃事，遑赴會日」，待秋收之時，又督責田畝租稅，以致農戶貧困，衣食不足。因此，他建議「宜暫息眾役，專心農桑」，「是以先王治國，惟農是務」。據此，所謂「佃事」指的是耕作之事、農事；所謂「委舍佃事」也就是後文所云「農人廢南畝之務」，也不意味著租佃關係。<sup>117</sup>

從田家荊本身的記載來看，「佃田」省記「佃」字比較常見，有的甚至改記為「火種田」。例如，嘉禾四年石下丘田家荊共計 24 枚，其中 1 枚記作「佃田〇町」（4.189），20 枚省記作「田〇町」，3 枚記作「火種田〇町」（4.201、202、208）。與此相同，吳簡中「火種租米」又記作「火佃租米」，例如：

117. 入廣成鄉嘉禾二年火種租米二斛胄畢 𠄎 嘉禾二年十一月十日彈洩丘潘觀關  
邸閣董基付三州倉吏鄭黑受（玖·4222）

118. 右諸鄉入火種租米一百一十一斛四斗（捌·3377）

119. 右廣成鄉入火佃租米 𠄎（玖·1274）

120. 入小武陵鄉嘉禾二年火佃租米一斛六斗胄 𠄎（玖·1459）

簡 117、118 中的「火種租米」與簡 119、120 中的「火佃租米」，為同一類租米。「火佃」即「火種」，這為「佃」作耕種解提供了更加直接的證據。另外，從秦漢「墾田租簿」的內容來看（節錄）：

121. 遷陵卅五年墾（墾）田輿五十二頃九十五畝，稅田四頃 𠄎 𠄎（里耶秦簡 8-1519 正）

122. 都鄉七年墾田租簿（走馬樓西漢簡）<sup>118</sup>

秦和西漢時期墾耕之田多稱作「墾田（輿）」。按《毛詩·信南山》：「信彼南山，維禹甸之。岫岫原隰，曾孫田之。」鄭玄箋：「甸，治也。岫岫，墾辟貌。」「信乎彼南山之野，禹治而丘甸之。今原隰墾辟，則又成王之所佃。言成王遠脩禹之功。」<sup>119</sup>「甸」「田」同義變文，作治田、佃田、耕作解。按鄭玄注解，「墾」「佃」均指耕種。準此，秦漢三國官文書中所記的「墾田（輿）」與「佃田」應當都是墾耕的田地，兩者可能具有源流關係。這亦為「佃」作耕墾解提供了佐證。

<sup>117</sup> 《三國志》（北京：中華書局，1959），卷六五，〈吳書·華覈傳〉，頁 1468。

<sup>118</sup> 馬代忠，〈長沙走馬樓西漢簡〈都鄉七年墾田租簿〉初步考察〉，《出土文獻研究》第 12 輯（上海：中西書局，2013），頁 213-222。

<sup>119</sup> 《毛詩》（收入鄭玄等，《十三經古注》第 2 冊），卷一三，〈小雅·信南山〉，頁 266。

田家莝中普通吏民佃種的「二年常限」熟田畝收 1.2 斛，且有「稅田」之稱（參 5.591、5.963）。竹簡中這類畝收 1.2 斛的田畝被稱作「民田」「民稅田」：

123. 領二年民田三百七十六頃六十<sup>五</sup>畝二百卅八步，畝收米一斛二斗，合四萬五千一百九十九斛一斗（壹·1637）

124. 其卅六畝二百卅五步民稅田，收米五十六斛三斗七（玖·124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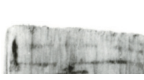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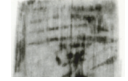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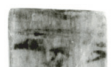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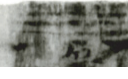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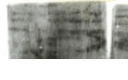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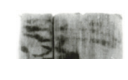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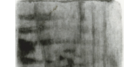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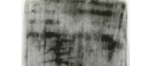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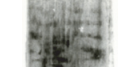








兩者的耕種人身分、田租額一致，田地性質皆為「民田」，與租佃無關。因此，我們認為，田家莝並非租佃契約。

（本文於民國一一一年二月九日收稿；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通過刊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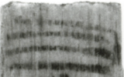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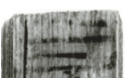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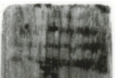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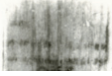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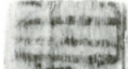










#### 後記

拙文的修改，得到熊曲女史、蘭德先生、魯家亮先生的惠助，兩位審查專家提供了寶貴的修訂意見，謹致謝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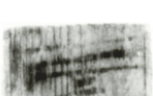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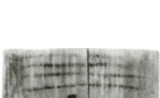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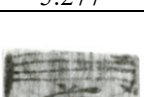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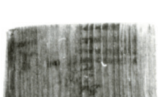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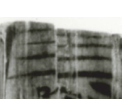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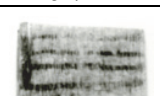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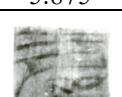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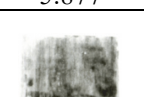




附錄一：田家荊中所見較為規整的同文符號

嘉禾四年田家荊						
左 荊						
	4.6	4.14	4.18	4.87	4.99	4.116
						
	4.118	4.125	4.131	4.143	4.194	4.251
						
4.254	4.258	4.260	4.266	4.272	4.305	
						
4.313	4.417	4.461	4.465	4.502	4.503	
中 荊						
	4.16	4.25	4.115	4.148	4.204	4.247
						
	4.253					
中 荊 (存 疑)						
	4.10	4.17	4.20	4.21	4.23	4.123
						
	4.128	4.142	4.153	4.205	4.207	4.208
						
4.246	4.255	4.256	4.257	4.259	4.265	
						
4.310						

嘉禾吏民田家荊的生成、性質及其功能

嘉禾四年田家荊						
右 荊						
	4.5	4.13	4.24	4.54	4.59	4.64
						
	4.66	4.91	4.95	4.97	4.117	4.119
						
	4.160	4.161	4.162	4.163	4.164	4.168
						
	4.174	4.177	4.214	4.215	4.249	4.271
						
4.273	4.280	4.281	4.290	4.291	4.292	
						
4.293	4.294	4.295	4.342	4.345	4.380	
						
4.384	4.389	4.392	4.393	4.405	4.430	
						
4.436	4.437	4.456	4.488	4.489	4.506	

凌文超

嘉禾五年田家蒯						
左 蒯						
	5.11	5.15	5.43	5.97	5.103	5.120
						
	5.123	5.126	5.130	5.160	5.193	5.199
						
	5.225	5.277	5.319	5.329	5.349	5.499
						
5.502	5.504	5.508	5.513	5.524	5.529	
						
5.544	5.570	5.612	5.618	5.630	5.654	
						
5.666	5.703	5.708	5.744	5.748	5.851	
						
5.875	5.877	5.886	5.926			
中 蒯						
	5.16	5.96	5.101	5.253	5.337	5.519

嘉禾五年田家荊						
中 荊						
	5.572?	5.661 <sup>120</sup>	5.697	5.698 <sup>121</sup>	5.745?	5.804 <sup>122</sup>
	5.810	5.891 <sup>123</sup>	5.937 <sup>124</sup>			
中 荊 ( 存 疑 )						
	5.14	5.25	5.29	5.43	5.67	5.68
	5.70	5.74	5.75	5.78	5.82	5.86
	5.89	5.94	5.102	5.124	5.186	5.191
	5.207	5.208	5.250	5.255	5.261	5.274
	5.345	5.347	5.348	5.380	5.389	5.39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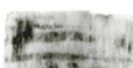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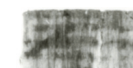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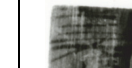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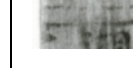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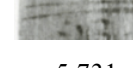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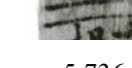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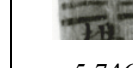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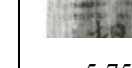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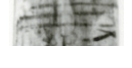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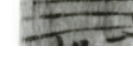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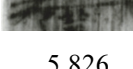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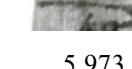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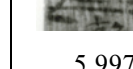












<sup>120</sup> 5.661 兩側遺存剖分線，右側部分文字因剖分削去而不完整；同文符號左側殘存「文」字一半，右側有兩豎筆，也應為先後調整的為剖分而作的記號。從這些跡象看來，該田家荊應為中荊。

<sup>121</sup> 5.698 右側殘存「文」字，左側部分文字被削去一小半，應為中荊。

<sup>122</sup> 5.804 左側殘存「文」字，右側部分文字如「敗」被削去部分筆畫，應為中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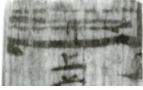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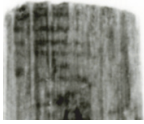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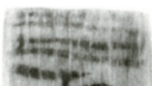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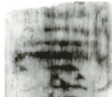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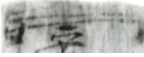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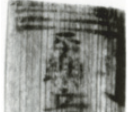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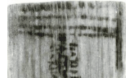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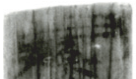




<sup>123</sup> 5.891 左右兩側遺存剖分線，應為中荊。

<sup>124</sup> 5.937 兩側遺存殘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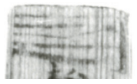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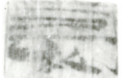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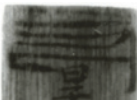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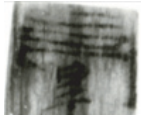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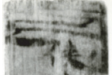










嘉禾五年田家劄						
中 劄 ( 存 疑)						
	5.402	5.428	5.432	5.498	5.500	5.543
						
	5.551	5.554	5.557	5.603	5.643	5.662
						
	5.665	5.668	5.675	5.676	5.686	5.693
						
	5.694	5.699	5.711	5.712	5.713	5.718
						
5.721	5.724	5.731	5.736	5.746	5.750	
						
5.751	5.757	5.803	5.806	5.808	5.814	
						
5.816	5.826	5.913	5.973	5.997		
右 劄						
	5.3	5.5	5.6	5.9	5.10	5.28
						
	5.31	5.32	5.35	5.36	5.51	5.5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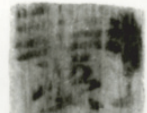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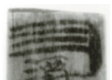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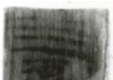






嘉禾吏民田家荊的生成、性質及其功能

嘉禾五年田家荊						
右 荊						
	5.62	5.71	5.73	5.76	5.77	5.79
						
	5.80	5.85	5.87	5.90	5.92	5.98
						
	5.104	5.119	5.125	5.129	5.131	5.145
						
	5.147	5.150	5.158	5.159	5.161	5.162
						
5.165	5.167	5.168	5.169	5.172	5.175	
						
5.177	5.178	5.180	5.181	5.183	5.185	
						
5.187	5.188	5.189	5.194	5.196	5.209	
						
5.216	5.219	5.221	5.224	5.226	5.229	

凌文超

嘉禾五年田家劄						
右 劄	 5.230	 5.235	 5.249	 5.251	 5.256	 5.257
	 5.262	 5.263	 5.264	 5.267	 5.268	 5.270
	 5.272	 5.275	 5.276	 5.330	 5.335	 5.346
	 5.364	 5.381	 5.391	 5.392	 5.393	 5.413
	 5.421	 5.424	 5.427	 5.436	 5.482	 5.491
	 5.492	 5.494	 5.495	 5.503	 5.505	 5.510
	 5.511	 5.516	 5.539	 5.552	 5.553	 5.562
	 5.571	 5.594	 5.601	 5.637	 5.671	 5.672

嘉禾吏民田家荊的生成、性質及其功能

嘉禾五年田家荊						
右 荊						
	5.679	5.680	5.691	5.707	5.710	5.727
						
	5.728	5.741	5.747	5.752	5.753	5.756
						
	5.761	5.766	5.774	5.777	5.779	5.783
						
	5.784	5.787	5.789	5.821	5.824	5.834
						
5.849	5.859	5.860	5.863	5.864	5.872	
						
5.905	5.917	5.924	5.932	5.935	5.936	
						
5.940	5.952	5.963	5.975	5.977	5.978	
						
5.980	5.984	5.986	5.991	5.992	5.994	

附錄二：田家荊上遺存的剖分線

剖分線 位置	簡號
左側	4.9、24、31、33（完整）、48、73、89、103（完整）、120、142、 166、168、176、179、181、261、281、282、291、309、311、316、 323、326、327、328、363、372、379、392、394、397、411、425、 437、441、442、446、456、460、469、476、489、499、501、515、 540、561、565、571、581（完整）、589、626（完整）、636、 641、664、727、739、740、750 5.35、85、90、119、202、212、252、253、257、364、367、369、 374、399、506、516、518、519、571、590、650、661、671、679、 686、729、732、740、780、798、800、808、814、847、849、880、 887、893、896、908、974、991、997、1025、1048、1091、1125、 1156
右側	4.35、36、37、41、42、44、50、57、62、67、69、72、79、90、96 （完整）、115、124、128、129、148、157、162、169、173、202、 205、258、269、284、290、299、306、315、330、344、355、359、 361、365、366、373、374、375、401、412、417、418、421、426、 466（完整）、471、472、474、478、485、493（完整）、500、 514、537、570、585、604、611（完整）、612、614、618、625、 635、639、648、662、673、684、694、701 5.20、25、49、53、69、78、88、93、176、236、241、255、259、 289、305、320、337、345、349、354、357、370（完整）、373、 383、384、388、395、534、555、559、585、638、652、676、714、 734、823、846、869、1039、1087
兩側	4.16、45、49、60、93、95、111（右側完整）、193、197、286、 301、318、377、448、519、525、600、617、633、668、772 5.481、519、657、891、916、1012、1134

附錄三：田家荊上的殘字

殘字位置 及狀況	簡號
左側殘字 (被削去)	4.37、62、129、205、286、365、366、374、428、477、478、 488、491、585、600、612、622、648 5.13、28、80、85、91、102、293、305、335、343、358、 363、369、488、550、672、679、693、705、754、780、803、 814、855、910、1008、1121、1127
左側殘字 (另荊遺存)	4.772 5.732、808、855
右側殘字 (被削去)	4.31、42、47、73、99、181、187、244、285、394、469、 476、481、639、685、740 5.84、248、301、348、522、523、623、647、673、692、 703、709、841、853、870、880、887、893、898、1101
右側殘字 (另荊遺存)	4.95、359 5.1039
左右側殘字	4.31、680 5.675、743、937

## 引用書目

### 一·傳統文獻

- 《三國志》，北京：中華書局，1959。
- 《毛詩》，收入鄭玄等注，《十三經古注》第2冊，北京：中華書局，2014。
- 《孟子》，收入鄭玄等，《十三經古注》第10冊。
- 《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2。
- 王念孫，《廣雅疏證》，北京：中華書局，1983。
- 宋少華主編，《湖南長沙三國吳簡（六）》，重慶：重慶出版社，2010。
- 長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編著，《長沙走馬樓三國吳簡·竹簡（壹）》，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
- 長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編著，《長沙走馬樓三國吳簡·嘉禾吏民田家荊》，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
- 長沙簡牘博物館等編著，《長沙走馬樓三國吳簡·竹簡（貳）》、《竹簡（叁）》、《竹簡（肆）》、《竹簡（伍）》、《竹簡（陸）》、《竹簡（柒）》、《竹簡（捌）》、《竹簡（玖）》，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2008、2011、2018、2017、2013、2015、2019。
- 侯燦、楊代欣編著，《樓蘭漢文簡紙文書集成》，成都：天地出版社，1999。
- 徐元誥撰，王樹民、沈長雲點校，《國語集解》，北京：中華書局，2002。
- 張家山二四七號漢墓竹簡整理小組，《張家山漢墓竹簡〔二四七號墓〕（釋文修訂本）》，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
- 陳松長主編，《嶽麓書院藏秦簡（肆）》，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15。
- 陳偉主編，《里耶秦簡牘校釋》第1、2卷，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12、2018。
-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里耶秦簡》（壹）（貳），北京：文物出版社，2012、2017。
- 劉珍等撰，吳樹平校注，《東觀漢記校注》，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
- 劉熙撰，畢沅疏證，王先謙補，《釋名疏證補》，北京：中華書局，2008。

### 二·近人論著

于振波

2009 〈走馬樓吳簡賦稅收支記錄管窺〉，《南都學壇》2009.4：24-29。

毛遠明

2009 〈釋「破券」、「破荊」及相關的一群詞語〉，《中國語文》2009.3：276-279。

- 王颯  
2014 〈嘉禾吏民田家荊字跡及相關問題研究〉，長春：吉林大學古籍研究所碩士論文。
- 安部聡一郎著，劉峰譯  
2015 〈典田掾、勸農掾的職掌與鄉——對長沙吳簡中所見「戶品出錢」簡的分析〉，《簡帛研究》2015 秋冬卷，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頁 238-256。
- 李均明、周自如、楊慧  
2001 〈關於長沙走馬樓嘉禾田家荊的形制特徵〉，《簡帛研究》2001，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頁 485-491。
- 李卿  
2001 〈《長沙走馬樓三國吳簡·嘉禾吏民田家荊》性質與內容分析〉，《中國經濟史研究》2001.1：122-131。
- 沈剛  
2017 《《長沙走馬樓三國吳簡》語詞匯釋》，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 邢義田  
2017 〈再論三辨券——讀嶽麓書院藏秦簡札記之四〉，《簡帛》第 14 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頁 29-35。  
2019 《今塵集——秦漢時代的簡牘、畫像與文化流播》，上海：中西書局。
- 孟彥弘  
2015 《出土文獻與漢唐典制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 邱東聯  
1998 〈長沙走馬樓佃田租稅簡的初步研究〉，《江漢考古》1998.4：73-77, 94。
- 侯旭東  
2006a 〈長沙三國吳簡三州倉吏「入米簿」復原的初步研究〉，《吳簡研究》第 2 輯，武漢：崇文書局，頁 2-13。  
2006b 〈走馬樓竹簡的限米與田畝記錄——從「田」的類型與納「米」類型的關係說起〉，《吳簡研究》第 2 輯，頁 157-175。
- 胡平生  
2012 《胡平生簡牘文物論稿》，上海：中西書局。
- 胡平生、汪力工  
2004 〈走馬樓吳簡「嘉禾吏民田家荊」合同符號研究〉，《出土文獻研究》第 6 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頁 238-259。

凌文超

凌文超

- 2015 〈走馬樓吳簡庫皮帳簿整理與研究〉，氏著，《走馬樓吳簡采集簿書整理與研究》，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頁 397-423。
- 2017a 〈走馬樓吳簡中的簽署、省校和勾畫符號舉隅〉，《中華文史論叢》2017.1：137-177。
- 2017b 〈新見「勸農掾料核軍吏父兄子弟木牘文書」補釋〉，《中國中古史集刊》第 3 輯，北京：商務印書館，頁 67-76。
- 2018 〈孫吳嘉禾元年品市布入受簿綜合整理與研究〉，《出土文獻研究》第 17 輯，上海：中西書局，頁 334-391。
- 2019 〈嘉禾吏民田家荊研究述評〉，《中國中古史研究》第 7 卷：何謂制度，上海：中西書局，頁 101-124。
- 2021 〈田家荊分類集成及數值、簽署問題〉，《出土文獻研究》第 20 輯，上海：中西書局，頁 453-520。
- 2022 〈走馬樓吳簡中所見的諸卒〉，《簡帛》第 24 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頁 205-221。

孫聞博

- 2015 〈秦縣的列曹與諸官——從《洪範五行傳》一則佚文說起〉，《簡帛》第 11 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頁 75-87。

馬代忠

- 2013 〈長沙走馬樓西漢簡〈都鄉七年墾田租簿〉初步考察〉，《出土文獻研究》第 12 輯，上海：中西書局，頁 213-222。

高敏

- 2008 〈論《吏民田家荊》的契約與憑證二重性及其意義——讀長沙走馬樓簡牘筭記之二〉，氏著，《長沙走馬樓簡牘研究》，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頁 10-16。

張春龍、大川俊隆、初山明

- 2015 〈里耶秦簡刻齒簡研究——兼論嶽麓秦簡《數》中的未解讀簡〉，《文物》2015.3：53-69, 96。

張榮強

- 2010 〈孫吳「嘉禾吏民田家荊」中的幾個問題〉，氏著，《漢唐籍帳制度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頁 290-306。

曹天江

- 2021 〈秦遷陵縣的物資出入與計校——以三辨券為線索〉，《簡帛》第 20 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頁 189-226。



- 郭洪伯  
2014 〈稗官與諸曹——秦漢基層機構的部門設置〉，《簡帛研究》2013，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頁 101-127。
- 郭慧瓊  
2021 〈走馬樓吳簡所見「守錄簡」整理與研究——兼論孫吳基層賦稅的轉運方式〉，《中國中古史研究》第 9 卷：吳簡，上海：中西書局，頁 65-90。
- 陳明光  
2009 〈走馬樓吳簡所見孫吳官府倉庫賬簿體系試探〉，《中華文史論叢》2009.1：27-56。
- 陳偉、熊北生  
2019 〈睡虎地漢簡中的券與相關文書〉，《文物》2019.12：53-62。
- 楊際平  
2019 〈我國古代契約史研究中的幾個問題〉，《中國史研究》2019.3：79-95。
- 楊際平、李卿  
2016 〈魏晉隋唐券書常見的有關署券、執券的套話〉，殷憲主編，《北朝史研究——中國魏晉南北朝史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北京：商務印書館，2004，頁 206-227。後收入楊際平，《楊際平中國社會經濟史論集》第 3 卷：出土文書研究，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頁 502-530。
- 熊曲  
2020a 〈試論嘉禾吏民田家荊的破荊——以大木簡的小孔為中心〉，《出土文獻》2020.3：115-121。  
2020b 〈走馬樓吳簡嘉禾五年諸鄉田頃畝收米鄉住簿研究〉，《簡帛研究》2020 春夏卷，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頁 284-297。  
2021 〈走馬樓吳簡中的市布及相關問題〉，《中國中古史研究》第 9 卷，頁 129-145。
- 蔣福亞  
2002 〈有關《嘉禾吏民田家荊》性質的補充意見〉，《南京曉莊學院學報》2002.1：17-19。
- 鄧瑋光  
2020 〈走馬樓吳簡案田簡的復原與研究〉，《出土文獻》2020.1：115-134。
- 鄧瑋光、吳瓊  
2017 〈試論「丘」及其相關問題〉，《南京曉莊學院學報》2017.5：27-38。

凌文超

羅小華、伊強

2022 〈「菱米」與「菱席」〉，《簡帛》第 24 輯，頁 199-203。

關尾史郎著，蘇俊林譯

2016 〈破荊、別荊考——以長沙吳簡為例〉，長沙簡牘博物館編，《走馬樓吳簡研究論文精選》，長沙：嶽麓書社，頁 515-526。

王素著，市來弘志譯

2007 〈中日における長沙吳簡研究の現段階〉，《長沙吳簡研究報告》第 3 集，新潟：新高速印刷株式会社，頁 48-87。

伊藤敏雄

2006 〈從嘉禾吏民田家荊看米的交納狀況與鄉、丘〉，《吳簡研究》第 2 輯，武漢：崇文書局，頁 90-138。

2010 〈長沙吳簡における米納入狀況再考〉，《歴史研究》（大阪）47：69-97。

2017 〈長沙吳簡中の朱痕和「中」再考〉，長沙簡牘博物館編，《長沙簡帛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上海：中西書局，頁 348-371。

谷口建速

2016 《長沙走馬樓吳簡の研究：倉庫関連簿よりみる孫吳政権の地方財政》，東京：早稲田大学出版部。

長沙吳簡研究會編，伊藤敏雄、阿部幸信主編

2004 〈『長沙走馬樓三国吳簡 嘉禾吏民田家荊』釈文補正〉，長沙吳簡研究會編，《長沙吳簡研究報告》第 2 集，新潟：新高速印刷株式会社，頁 95-106。

關尾史郎

2001 〈吏民田家荊の性格と機能に関する一試論〉，長沙吳簡研究會編，《嘉禾吏民田家荊研究——長沙吳簡研究報告》第 1 集，新潟：新高速印刷株式会社，頁 3-15。

2014 〈穀物の貸与と還納をめぐる文書行政システム一斑——東アジア古文書学の起点としての長沙吳簡——〉，角谷常子編，《東アジア木簡学のために》，東京：汲古書院，頁 99-123。

### 三・網路資訊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2014 〈益陽兔子山遺址出土簡牘（三）〉，湖南考古 [www.hnkgs.com/show\\_news.aspx?id=975](http://www.hnkgs.com/show_news.aspx?id=975)，2014.12.10。

## The Production, Nature, and Function of Contract Agreements 莝 of Farming Households in the Three Kingdoms Period

Wenchao Ling

School of History,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Features found on contract agreements, namely *bie* 莝, of the farming households of officials and of commoners from the Jiahe era of the Three Kingdoms period (232–238), such as contents stretching across multiple portions of the originally intact tablet, dividing lines, residual broken characters, and repeated text, reveal that these agreements conform to the characteristic of “writing large characters in the center and breaking them from the middle.” In many cases, the horizontal strokes of the character *tong* 同 stretch across the left, middle and right portions of the agreement, division lines are visible, or traces remain of the two *wen* 文 written at the junction of the edges of two pieces of the tablet after it was split. When two copies, namely portions of the original tablet, remain of a specific agreement, the left and right cannot always be spliced together, evidence of a missing third; moreover, some middle portions have been identified. All of the above evidence indicates that the contract agreements of farming households were likely produced in triplicate on one tablet that would then be divided into three, shape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which are roughly the same as those of similar agreements from the Han to Jin dynasties.

“Entry and reception” contract agreements produced on bamboo slips related to land tax were also made in triplicate, but their administrative functions differed from those of the contract agreements of farming households. The former, used as a form of proof of delivery, were produced to record the goods entered into and taken out of granaries and warehouses, thereby reflect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district, which was in charge of transportation, and the granaries and warehouses receiving the goods. The district office retained the left side of the agreement which recorded the delivery, whereas the granary or warehouse kept the right side detailing that they had received said goods. The middle portion of the tablet, which likewise recorded the reception of the goods, was submitted to the granary bureau or the supervisory body of the county court for inspection.

凌文超

In contrast, the contract agreements of farming households reflect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districts, households, and related bureaus. The district, representing the Sun Wu dynastic state, produced these forms based on contract agreements indicating “delivered [goods],” household registers, and landholdings registers, and each recorded the household’s land rental payment as well as the goods they had delivered to the granary or warehouse. The left side of the certificate was given to the household, the right portion was retained by the district, and the middle of the tablet was submitted to the supervisory bureau. The bureau officials overseeing the fields and households then checked the contract agreements of the farming households from each district according to the “entry and reception” agreements, namely the middle section of the tablet, kept by the granary bureau or related supervisory agency as well as according to the goods received from the households, fields, and granaries and warehouses within their jurisdiction. The contract agreements of farming households of the Jiahe era thus held three functions: certifying that the households paid their taxes, confirming that their goods had been delivered, and reconciling the potential discrepancies between documents. In this way, the contract agreement system of the Sun Wu state inherited the traditional practice of “contracts in three divisions” of the Qin and Han dynasties.

**Keywords: Sun Wu dynastic state; Zoumalou bamboo slips; contract agreements of farming households; contracts in three divisions; delivery and reception contract agreements**